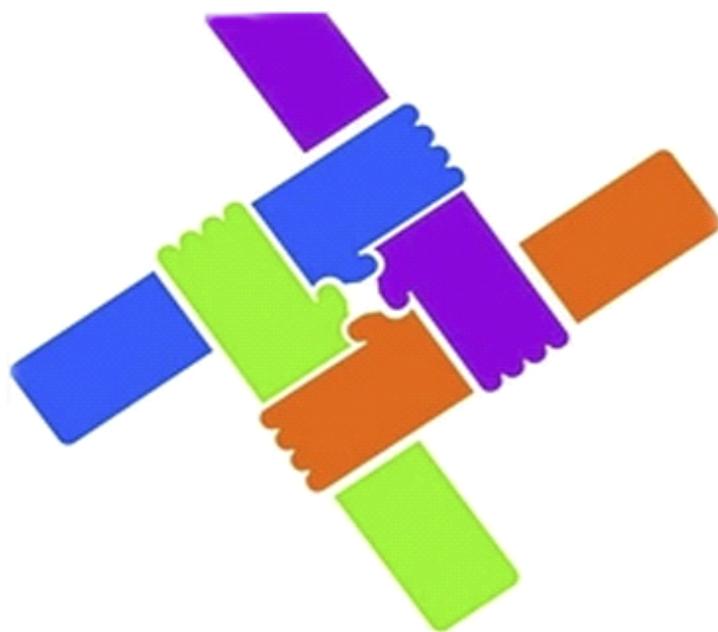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4月30日第4期 总第18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2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八）

【编者的话】

多种声音，一个平台 2

【专稿】

王复兴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初探 3

宫香政 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兼与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 18

【述往】

陈子明 樊能廷 韩长绵 华国藩

李国俊 姚建明 张 俭 朱开定
1968年329的北大武斗——48年后的集体回忆 40

吴 琼 难忘的燕园·1969（三）——回到38楼的半年 45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六）——回家的路 50

宋翔燕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九）——“五七千校”（下） 57

【文摘】

屈长江 良知漫漶的岁月 73

【读者来信】

1. 北京大学谢定国《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被胡佛档案馆收藏 84

2. 北京四中老高三任富田谈王复兴文 3. 宋翔雁谈地方文革史的编写 86

4. 杨隽谈地方文革史写作和美国国会档案 5. 郭予庆谈校对及萧宏文章 87

6. 俞小平谈北大文革 7. 碧琼子谈广西文革和萧宏文章 88

【本刊声明】

【编者的话】

多种声音,一个平台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献《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我把它改造一下,做这篇小文的题目。

自从刊载高校文章以来,就不断地有人指责《记忆》,或说《记忆》有派性,发某派的文章多了,发本派的文章少了。或说《记忆》搞平衡,不分好坏,一视同仁。长了坏人志气,灭了好人威风。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居然出现在最近发来的同一封信里。

什么是派性?派性就是对事物的不同看法。派性没有资无之分,只有是非之别,但是非并不是某派的专利。这件事可能你对了,他错了;那件事可能你错了,他对了。《罗生门》告诉我们,即使是同一个事实,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解释。

一个正常的国家,健全政府,在保持思想多元的基础上,会尽量地加强社会认同,防止话语霸权。而文革时的中国正相反,它是在思想一元的前提下,尽量制造事端,扩大分歧,挑动派性。文革中的派性能延续至今,就意味着它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改变。

要弄清真相,就得让人说话,读者就得接受不同的声音,持有某派观点的,可以分辨,可以反驳,但不能封人家的嘴。《记忆》的宗旨是留下当代人的思考和历史资料。《记忆》没有能力判断谁对谁错。我们只能恪守众生平等,让传播内容多样化,让读者做出选择。

我们防止派性的办法很小儿科,一是看指摘人家,述说真相,有没有证据。拿不出来,或者只有孤证的,对不起,退稿。二是把火药味浓的语言删掉。比如,最近一位对《记忆》表示遗憾的朋友,推荐来的文章是这样的标题“揭穿XXX的谎言”,我们把它改成了“与XXX商榷”。《记忆》期待高人,教给我们更好的办法。

多种声音,一个平台。谁是谁非,交给后代。■

2017-2-23

【专稿】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初探

王复兴

—

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矛头指向剧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实际指向了吴晗后面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1964至1965年北大曾经历过一场社教运动。运动第一阶段，中宣部进驻北大的工作队动员干部、党员、教师给陆平党委提意见。社教第二阶段，改组后的工作队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此会为整风会议，整那些“社教左派”（前段运动中给党委提意见的积极分子）。后来第一张大字报的七名作者当时都是被整对象。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作为工作队副队长，担任“整风”会议的主持人。

1966年4、5月，报刊公开点名批判“三家村”的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对北大的冲击很大。笔者所在的北大历史系当时正在开展史学批判，同学们一直很关注从评《海瑞罢官》开始的对吴晗的批判。到了1966年4、5月，大家明显地察觉到，学术批判上升到了政治斗争。1966年“五一”劳动节，彭真没有上天安门。大约在5月3日，历史系一年级世界史班开会时，笔者和班长高发元、干部子弟张明华一起议论了彭真没在天安门上露面一事，猜测彭真出事了。而后在彭佩云（北大党委副书记，当时在历史系蹲点，领导半工半读教育革命及史学批判）主持的各年级部分学生座谈会上，干部子弟张明华发言：“彭真反对毛主席，就打倒他！”会

后彭佩云指示党员教师，注意学生张明华的言行、动向。当时北大的政治气候已如此，学生们尚且如此敏感，何况那些经历了社教和在“国际饭店会议”被整的干部和教师呢。

在1966年5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罗、陆、杨被打倒，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指出，要警惕“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毛泽东亲自增加的这句话，点出了他内心恐惧之事。《通知》号召人民起来，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月19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和副书记赵正义听了传达，做了笔记。会后聂、赵向在国际饭店整风会议中哲学系被整的社教积极分子宋一秀、杨克明、夏剑彘、高云鹏等人做了传达。聂元梓及被整的最厉害的哲学系的“左派”们坐不住了，他们想要“平反”，讨个“公道”，开始行动，酝酿给陆平贴大字报。

二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城乡开展起“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社教运动）。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随后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毛泽东这个论断不容怀疑。从而使这一论断成为党中央对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的权威性的估计，并直接影响了北大的社教运动。

按照中央书记处的安排，1964年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试点。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中宣部调查组于1964年7月2日进驻北大进行调查，而后于11月5日中宣部正式开展北大社教运动试点。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在北大开展“社教”，奉行的是中共中央开展“社教”两个文件：“前10条”“后10条”（“23条”在北大“社教”途发表的）。工作队的思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动群众给陆平党委提意见，而后上纲上线。哲学系提意见较踊跃。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起初给党委书记陆平提意见，主要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后来在工作队的引导之下，把陆平的问题

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¹11月29日，张磐石给中央的《二号报告》提出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向。”1965年1月6日，工作队召开北大党委扩大会，工作队副队长刘仰峤做报告，说“我们学校的运动在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已初步揭开，初步形成了一个积极分子队伍，现在工作队员已有200多人。现在准备有步骤地把运动推向党外，发动大家揭发领导问题。”“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领导骨干中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学校首先是校党委。”张磐石领导北大“社教”，简单地说，就是发动群众给领导提意见。有些像1957年的“整风、鸣放”。群众在工作队的动员下，给党委提意见。与1957年不同的是，在工作队的指导下，群众提意见逐渐上纲上线，批判党委的资本主义方向、道路问题，而不是争民主、要自由。接下来，也像1957年反右，北大“社教”在第二阶段发生了转折，反过来整那些“社教积极分子”（前段运动中积极提意见的人）。

1965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北大社教运动，邓小平指出，“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了错误”，批评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对北大估计错误，当做‘烂掉’的单位去搞。”“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⁴4月29日，陆定一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工作队队长职务，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任队长，新的副队长中有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从1965年3月29日至9月，北大“社教”进入第二阶段的“国际饭店会议”，以“整风”为名，整前一段提意见的积极分子。6月下旬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北大工作队及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讲要把张磐石的错误“作为大是大非问题解决好。”并说，“有的人说，不应该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判不得？”7月29日起，北大党员、干部开始了“整风学习会”，即“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会议重点是以“整风”为名，整那些“社教左派”。邓拓鼓动给积极分子“整风”，“要刺刀见红。”文革初期北大学生中流传着哲学系孔繁在国际饭店会议中说的一句话：“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孙蓬一，还有郭罗基。”他们不服，顶得很厉害。

¹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 2005 年 1 月出版，第六章第四节。

⁴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4 月第二版，1965 年 3 月 3 日条目。

孔繁、孙蓬一、郭罗基三人顶得最厉害。“国际饭店会议”到1965年9月基本结束，但对哲学系的整风，因对立两派僵持不下，一直延续到1966年1月，长达6个多月，后因形势有变而停止。

笔者于2015年4月29日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曾向第一张大字报签名人之一高云鹏询问“国际饭店会议”情况，高云鹏讲：“在‘国际饭店会议’整那些在‘社教’中提意见的积极分子，主要是整哲学系的，想把哲学系的一批人打成‘反党小集团’。后来批判‘三家村’，邓拓这些人自身难保，于是就草草结束了‘整风’，把参加‘整风’的社教积极分子，以‘参加四清运动接受教育’的名义分散到农村，‘化整为零’，打算将来不让这些人回北大，就留在农村了。‘国际饭店会议’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邓拓。66年4月报纸上批‘三家村’，点了邓拓的名，被整的积极分子们就想到‘翻身’、‘伸冤’的时机到了。”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在“国际饭店”被批斗后，听说要派他们下去“四清”，然后留在农村不让回来了。她当时就想调离北大。5月19日在北大党委会上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知道彭真垮台了，认识到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打倒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感到“北大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在社教中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所受的批判和冤屈有希望得到解决了。”她开始时，打算给毛主席写信投诉。后来与其他人联系，大家商量后，决定给陆平贴大字报。¹2017年1月21日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上，夏剑彘说：“5月23日，大家讨论，有我、聂元梓、赵正义、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讨论是给毛主席写信？还是写大字报？共同商定贴大字报。当时并没有什么曹轶欧的指示。”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没有《五一六》通知，就没有第一张大字报；没有“国际饭店会议”，就没有第一张大字报。《五一六通知》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之下达以及北大“国际饭店会议”中官民矛盾之激化，这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产生那张大字报，引爆文化大革命的两大要素。

¹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 2005年1月出版，第八章第二节。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有七个人签名，都是哲学系的干部、教师。除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外，有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李醒尘。七人的共同点是在北大社教中都是给党委提意见的“社教左派”，在“国际饭店会议”都挨过整。他们都是对党的某位领导不满，因而给领导提意见，也因提意见而被领导视为“反党”被整。北大社教的第二阶段“国际饭店会议”，由中央书记处负责（总书记邓小平是1957年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由常务书记彭真直接指挥，开展运动的思路完全是按照1957年反右的经验。在文革初期的50天，我们再次看到刘少奇、邓小平派遣的工作组，按照反右思路领导运动。为什么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个签名人都是哲学系的？因为哲学系整人最厉害，斗争最激烈。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五十多天”，是由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领导文革初期运动的时间。那“五十多天”是刘、邓在新时期在全国开展的一场大规模反右斗争。刘少奇、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对人民的迫害者。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学者宋永毅研究、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讲“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时还指示：“在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²按当时100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际上在北京24所高校（不到北京高校的一半），工作组在“五十多天”的“反干扰”、“抓游鱼”、“揪反动学生”的斗争中，已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³如果扩展到全国的大专院校，加上中学，到了运动后期，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1957年。

²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书屋，2010年，238页。

³“首都三司”小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

清华的蒯大富在1966年6月21日贴出反工作组的小字报。工作组的王光美说蒯“要夺权”，薄一波指示“要反击”。工作组组织师生在校园游行，高呼“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全校开展“反蒯”斗争，各系整了很多学生。王光美的清华工作组比北大的新市委工作组整人厉害。北大揪出了40多个“反动学生”，清华揪出了800多个“反动学生”。¹因此清华学生后来批“资反路线”的反弹力度就比北大大得多。8月初周恩来到清华为蒯大富平了反。平反后的蒯派组成“清华井冈山兵团”，矛头直接指向了王光美、刘少奇。毛泽东一反1957年之道而行之，利用了反迫害，要自由的群众，反过来冲击刘邓控制的党务系统，以夺回他自己所说的已“大权旁落”之大权。毛泽东曾把自己的斗争谋略总结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文革中，人们多次看到毛泽东纯熟地运用这一手。

文革初期，一部分群众批评基层党的领导干部，给领导贴大字报，一般都会被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团员骨干视为反党，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文革初期群众所说的“保皇派”大军也是因此而形成。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便有许多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这是反革命大字报，反党”。²陆平在5月25日当晚召开党委常委会议，布置反击。于是从26日起，校园增多了许多批判第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有的提出“对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聂元梓，一定要法办！”有的指聂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³有许多人在大字报前宣誓，有人演讲，高喊要“保卫校党委！”“粉碎反革命进攻！”这种从上至下的1957年反右思路，到了1966年8月开始逆转。1966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于8月5日的一条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错误的领导，要广泛地进行抵制”。⁴《人民日报》也于8月发表社论宣传这一最新指示。从而扭转了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的流行观点，推动了全国上下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

¹ 胡宗式：《北大教我民主》（为北大物理百年征文而作），《北京市地方文革交流网》2013年10月29日出版。

²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第八章第六节。

³ 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24、25页。

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2页。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对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加注。

三

文革后，有一种说法是康生夫人曹轶欧指使聂元梓等人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此说法不符合事实。笔者作为北大文革时的学生，切身感到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是北大内部的小气候和全国的大气候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

据笔者调查，大字报最初酝酿者是宋一秀、赵正义两个人。尔后，聂元梓及另外4人陆续加入。赵正义、宋一秀分别起草了第一、二稿。宋一秀在24日白天完成了第二稿，杨克明在24日夜晚把稿件改写成大字报，完成第三稿。郭罗基曾对笔者讲，“大字报的风格完全是杨克明的。”杨克明是大字报的主要作者。25号上午5人共同审稿（杨克明、李醒尘不在场）。聂元梓于最后与大家一起审稿时，在大字报稿结尾处加了一段话和三句口号。

当时中央有个“中央理论小组”以调查学术批判为名在北大，组长是曹轶欧。聂元梓在25号之前曾和杨克明一起通过张恩慈去找曹轶欧询问：“能不能给北大陆平党委贴大字报？”曹轶欧回答：“能，只要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就行”。¹贴大字报的立意，是六人决定在先，曹轶欧知道在后。（李醒尘是在25号贴大字报前才签了名）。大字报底稿直至25号上午贴出之前才完稿，大字报内容曹不可能知道。聂元梓向曹轶欧询问一事，除了杨克明之外，其他五人在贴大字报之前均不知道。聂在《回忆录》中说，在大字报贴出之前，她曾把询问曹之事告知五人。这应是聂所记忆的时间有误，不准确。高云鹏亲自告诉笔者，他和宋关系较好，他和宋一秀在贴出大字报之前，肯定不知道此事，没听聂元梓讲过。何况李醒尘直到25号临近中午才知道六人要贴大字报之事，了解了大字报内容后，马上最后一个签了名。大字报贴出后，全校轰动。调查组的张恩慈找杨克明要了大字报底稿。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教员，在北大社教中与聂元梓在同一阵线，社教后调到马列主义学院工作，当时在曹的办公室工作。张恩慈把大字报底稿交给了曹轶欧，曹交给了康生。康生、曹轶欧在第一时间支持了大字报是事实，说他们“指使”聂元梓七人贴大字报则不

¹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 2005年1月版，第八章第三节。

符合事实。文革后，聂元梓并未因康生被否定而把贴大字报的责任推给康生，其他六人无一承认大字报是受康生、曹轶欧“指使”。

按王学珍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所述：5月25日“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似乎康生是搞阴谋。实际情形是，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5月27日大字报被刊登在第13期《文化革命简报》上，《简报》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编印的。¹《简报》是由报送中央领导的党的文宣机构上报的。康生当时已是中央文革成员，他的行动是在党的政治纪律的规则之内。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的时间，正值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快将结束之时。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当时在外地）。康生是大会文件《中共中央通知》起草小组成员。《通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起草并审定。在会议期间，康生和身处外地的毛主席之间，起着联络员的作用。5月16日中央会议通过的《通知》宣布撤销了原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康生以顾问身份名列正式成员。康生向毛主席反映与《通知》有关的社会动态，完全是责内之事、合法行为，谈不上“阴谋”。历史的真正教训是，在五月会议上，当毛泽东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时，竟无人抵制。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获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通过，文革大动乱由此开始。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竟无一人是“男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之一固然与众多中央高级干部的软弱、妥协有关，与他们的封建“忠君”思想有关，但更重要原因应与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得不到制衡、监督、约束的体制问题有关。

当毛泽东看到第13期《简报》时，已是6月1日中午。阅后即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不是康生打给毛泽东），要广播这张大字报。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阿尔巴尼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

¹《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第五卷，第589页。

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¹于是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大字报。

当时毛泽东有个批示，是写在《简报》上。批示是：“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所以能产生核爆般的效应，冲击波瞬间波及全国，并非康生的作用，而是由于毛泽东的旨意与意志，毛泽东无疑是最重要的第一责任人。

2015年4月29日，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时，笔者询问高云鹏先生关于大字报出世过程的具体细节。高云鹏先生虽已高龄，但身体健朗、思路清晰。他说：最初是宋一秀和赵正义应约给《解放军报》写一篇稿，主要讲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赵、宋分别写了第一稿、第二稿之后，高云鹏、杨克明、夏剑豸、聂元梓参加了进来。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干脆改成写大字报。于是杨克明于24号晚写成第三稿，把稿子改写成大字报的形式。25号早6点，杨克明去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上班前，把修改稿交给了高云鹏（当时杨克明已经调到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但仍暂住在北大）。高云鹏与宋一秀在24楼宿舍里把这份稿子修改了一遍，大概10点左右赵正义、夏剑豸也来了。此后聂元梓也来到24楼，五个人一句一句商讨稿子，确定一句抄一句。高云鹏和夏剑豸分别抄写成大字报，大字报抄了两份，12点多完成，分别签上了名字（杨克明的名字是高云鹏代签的）。当高云鹏拿着抄写的大字报去大饭厅贴的时候，在楼道里遇到李醒尘，李询问了大字报内容后，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所以签名的是七个人。当时抄了两份大字报，高云鹏抄的那份贴到了大饭厅东南墙。（夏剑豸抄的那份原本打算贴到五院哲学系办公室，但是第一份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引起轰动，第二份便没贴出去。这份大字报后来被中央办公厅要走，再后来被首都图书馆当成文物收去了。）25日下午2：30左右大字报贴到了大饭厅东南角。从高云鹏以上所讲细节，有几点值得注意：1. 最初宋、赵二人是要给《解放军报》写稿，结合北大实际讲文化革命实质是政治革命。这表明他们当时是在紧跟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大形势，从学术批判转入政治斗争。2. 他们写稿给《解放军报》，而不是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

¹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是因为最初是《解放军报》向赵正义、宋一秀约的稿。《解放军报》当时是最紧跟毛泽东的报纸。3. 决定不投稿而改成写大字报，这是六个人经过讨论的共同决定，无人“指使”。4. 在最后一天25号上午，最后审稿、定稿、抄写至贴出大字报，时间非常紧凑，根本没时间向任何人汇报大字报内容。总而言之，从大字报的立意、内容到张贴，曹轶欧都没指挥和参与，“指使”一说不能成立。

笔者于2015年4月17日拜访聂元梓，向她求证：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她再三强调是“自发的”。她认为贴大字报的冲动是来自于七人自身。而她下了决心要起来与陆平党委斗争则是在1966年5月19日听了北大党委传达《五一六通知》。《炎黄春秋》于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聂元梓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与康生老婆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聂元梓的这个说法符合历史实际。

彭佩云（文革前北大党委副书记）在2006年《百年潮》第02期发表了《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一文。该文认为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出来的。”彭佩云在文中提出“证据是充分的，主要是三条”。

证据一，康生在文革中的1967年1月22日一次讲话中说，他于1966年5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北大，“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的。”康生在这里的用词并没说大字报是曹轶欧“授意”、“指示”或“动员”下写的，而是“促动”，意思很含糊，大概是“促进”之类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指使”。在文革时期，康生想把第一张大字报的功劳往自己身上拉，如确实是曹轶欧“指使”，康生不会用“促动”一词，而会用“组织”、“动员”“指示”“指导”类的用语。党内知名的大才子康生用词是很考究的。康生应是顾虑到重大历史事件他不可作伪、失真，但又要表功，便只能含糊其词，用了“促动”词，让人觉得他起了重大作用。康生在1966年5月26日中央文革主持的北大万人大会上，也有类似彭佩云所说的那种表达，康生讲话时说：“6月1日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大字报，毛主席指示中央台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从而使聂元梓等七同志

获得解放，我也获得了解放”。康生没讲他在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中具体做了什么事，模糊地说和七人同时“获得了解放”，笔者当时在万人大会现场，便明显地感到康生可能起了很重大的作用，这应是康生这么讲所要达到的效果。这也是后来误导人们以为大字报是曹轶欧、康生具体策划、指使的一个重要原因。

证据二，彭佩云写道：“刘仰峤 1979 年 7 月 16 日提供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并非当事人的刘仰峤听张恩慈讲的，刘说，“大字报出来后，张恩慈告诉我：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授意下由他出面和杨克明商量后杨克明写的”。刘仰峤本人并没有和杨克明联系过，他只是听张恩慈所说。然后彭佩云引用刘仰峤的结论：“大字报主谋是康生、曹轶欧，串联是张恩慈，执笔是杨克明”。这里有个关键点不准确，说“执笔是杨克明”，但事实是大字报底稿执笔人有三个，杨克明是第三位（最后一个）起草人。在杨克明修改第三稿之前，赵正义写了第一稿，宋一秀写了第二稿，这表明已经酝酿和动笔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谁“指使”了赵正义？谁“指使”了宋一秀呢？另外，李醒尘是直到 25 号中午贴出大字报前之前，才知道大字报内容并签了名，谁能在最后时刻“指使”了他？不可能嘛！而且，即使杨克明与张恩慈曾单独议论过能不能给陆平贴大字报，在六人商量把稿子改写成大字报时，杨克明并没有提到他和张恩慈议论过贴大字报一事，贴大字报是六人讨论后的共同决定。

证据三，彭佩云引用杨克明在 1978 年 12 月一份材料。杨写道：“我听到《五一六》通知传达后，找张恩慈说：我们也要向中央反映才好。张说：现在中央通知已下达，向上反映情况还少得了，上面哪里能看得过来那么多。他又说：现在北京市委机关里已经有人贴大字报了，还是这样来得快。我当时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彭佩云又进一步引用杨克明在 1978 年 6 月写的另一份材料里讲“张恩慈的话对我确实起了启发作用，又可说是暗示作用。”彭佩云凭这些材料就断定是“指使”，显然不能令人信服。杨说他只是受了张的“启发”，这里引用一个哲学原理：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冲动，主要来自于他本人。杨听了传达《五一六通知》后，就有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念头。何况大字报其他五位签名人并未和张恩慈接触并受其影响。

结论：彭佩云的三个证据不能证明有人“指使”。

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曹轶欧或张恩慈曾找过大字报七名当事人或其中的三、四个人一起开过会，传达康生指示，要他们贴大字报，指示怎样写。即然如此，那么，彭佩云所说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泡制出来的”，“泡制”一说又从何而来呢？

四

在1964年北大社教之前，北大内部的社会矛盾是怎样逐渐积累并激化的呢？远的不说，让我们从1957年陆平到北大上任开始进行探索。

1957年反右时，彭真批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右倾”，认为他反右太手软，便把陆平派到北大代替江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把江隆基调走。陆平到北大就是来纠正“右倾”的。同年10月，陆平上任不久就搞了个“反右补课”，补课三个月，到1958年1月底，增划右派173人，使北大右派总数达到699人，其中学生589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师生占当时师生总人数的7%。北大有5名右派学生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去世，最著名的是中文系的学生林昭及历史系学生沈元。¹

1959年邹鲁风任北大副校长，他负责北大、人大联合调查组，调查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调查组整理的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反右倾运动一来，调查组整理的材料被批判是“反对三面红旗”，“猖狂攻击人民公社”。陆平把责任全部推给邹鲁风，主持党委会批邹，调查组人员也挨了批。本来北大、人大联合调查组是两校党委的决定，由北京市委批准。而陆平则批邹鲁风是“背着北大党委”。（文革后刘仁证实，联合调查组是两校党委决定的）。1959年10月25日晚，陆平到邹宅与邹长谈，要邹认真检查错误。第二天（26日）晚，邹自杀身亡。邹死后，陆平批判邹是“叛徒”，把邹开除了党籍。以上即北大老人们广为流传的“陆平赶走了江隆基，逼死了邹鲁风”。

¹王友琴：《研究报告：〈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华夏文摘》增刊第601期2007年9月26日出版。

紧接着，陆平打倒了马寅初。1958年、1959年毛泽东在中央几次点名批判了马寅初。1959年11月，陆平在康生指示下，在全校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民主人士、老校长马寅初“人口论”的运动。当时许多干部反对批马，陆平答复说：“非批不可！”当时批判马的大字报贴到了马的家里，甚至床头。马寅初被批下台。1960年3月28日马寅初被国务院免去北大校长的职名，而后陆平取而代之兼任了校长。¹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规定在三级干部以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北大却整到了三级以下，郭罗基当时只是个党员教师，也挨批被整。

1960年继续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任数学系常务副主任的丁石孙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1960年，北大整了100多个“反动学生”，停止了学业，被送回了原籍。

笔者的学长、1962届毕业生王曾喻在《北大五年》（刊于《北京大学新闻网》）一文中，详述了陆平领导北大期间，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批马寅初，1961、1962年教育改革。他说他在北大的五年是“多灾多难”的时期，“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并说“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谈及陆平，极有恶感”。他感叹陆平终于“难逃文革一劫”。

北大副校长周培源于1965年7月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见到周恩来，总理问他北大社教情况，他说北大社教很复杂，要写个材料交总理。第二天他便交给总理一封信，状告陆平在北大“乱干”，把北大搞得很乱。北大社教后期，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的看法，周培源不接受。5.25大字报贴出后，周培源在现场看了大字报后回家，对夫人、孩子说：“我向总理告状，告的就是大字报所指的三个人”。他当晚在北京科学讨论会物理会议筹备小组会上，兴奋地对大家说：“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²

北大历史系干部吴维能的遭遇很有典型意义。他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毕业后留校，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系办公室主任。他应属于陆平体制内的培养对象。1959年因家乡有

¹韩三洲：《陆平与邹鲁风之死》，《南方都市报》2012年2月28日。

²薄亚达：《十年风焰漫燕园》，《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2010年8月10日出版。

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讲了出去，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派到食堂干活。文革一爆发，他马上造反，翻身成了陆平体制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校文革委员。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追查他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他被逼于1968年11月4日在圆明园投湖自尽，终没能逃过陆平定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劫难。

郭罗基先生曾于九十年代末在香港《开放》杂志刊文，给自己定位是“中共党内的反对派”。表示他从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4年社教到文革爆发，一直是中共北大陆平党的反对派。另据美国中文网记者亚衣对郭罗基的采访，郭回顾了他在文革前的北大经历，他说道：他因“右倾”，在“1957、1958、1959年都受过批判”，也做过检讨。他在“1957年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向共产党的反对派，从此陷入厄运”。“从1962年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反对派”。郭说“1965年，我和北大哲学系一些人被发配到农村，党委书记陆平对我们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当时已作好思想准备在农村消磨一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改变了命运”。¹

郭罗基在1957、1959年都曾因右倾言论受过批判，也做过检讨。从1962起他决心不再向党领导做任何检讨（注9）。在1965年的“国际饭店会议”上，他和孙蓬一顶得最厉害。从郭罗基由1957年到文革前夕的北大经历，研究北大的内部矛盾，说白了，就是整人和反整人的历史。正如郭罗基对笔者所说：“我的头上长期戴着‘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在当时，没有比这更大的帽子了。我确实反对‘三面红旗’，自信是正确的，不是错误，更不是罪行。我拒不检讨，但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如果辩护，正好坐实他们所说的罪错。所以，我叫得响的就是反对整人。”

陆平领导北大时，运动不断，整了很多人。有压迫就有反抗。到了1964、1965年，北大民众对官僚的反抗，出于本能，只会攻其“右倾”，而不会攻其“极左”，否则就会政治不正确。到了文革，民众出于不满，在潜意识推动下，利用形势，冲破压制，起来造反。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

¹薄亚达：《十年风焰漫燕园》，《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2010年8月10日出版。

2010年7月在《领导者》第34期，刊载了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想些什么？》一文。聂元梓对采访她的韩三洲讲：“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这是聂元梓作为文革的第一批造反者，在其晚年，回顾了从1957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的北大历史后，所道出的心中“实话”。

应指出的是，聂元梓等哲学系左派，在文革之初首批造反，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是紧跟毛泽东的旨意，从左倾的立场出发，以左倾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批判修正主义，反陆平党委。从1957年反右到1966年“5.25”大字报，北大的形势是越来越左，直至文革爆发。

笔者曾向郭罗基老师求教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至文革爆发这段时间，对北大政治史的看法。郭给我回电邮指出：“文革前，北大的历史就是不断‘翻烙饼’。从57年开始到社教以前，是领导整群众、上面整下面，陆平党委积怨甚多。社教是工作队发动群众整领导、下面整上面，争相出气，翻了一次烙饼。社教后期的反攻倒算，又是领导整群众、上面整下面，整得更狠，烙饼又翻过来了。文革是烙饼再翻一次，群众整领导、下面整上面，整得狠上加狠。在左倾的潮流下，要整人，不论是上面整下面还是下面整上面，都必须抓对方的‘右’。这样，自己就在‘左’的台阶上进入更高的一级。文革是在‘左’的台阶上达到顶点，才能物极必反，非如此左倾路线不会破产。” ■

2015年10月12日初稿

2017年2月10日完稿

【专稿】

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兼与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

宫香政

有一句名言，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套用这句名言，北大在文革中发生的武斗，也是政治的继续，是“路线斗争”从文斗到武斗的升级。北大武斗，既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激烈的。当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武斗，甚至是动用了火器的非常惨烈的武斗。这一乱象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人们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把不同政见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这是“不可调和的”。

本人是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主要成员，曾参与指挥了北大“3.28—3.29”武斗，并且自己也参加了武斗（还受了伤）。搞武斗是极端错误的，很对不起两派校友。在此，我向校友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着悠久历史的北大，在文革中成为一个重灾区，由分裂而发展到武斗，有一个不断激化的过程。除了内部原因外，还有非常深刻的外部背景，如1968年3月25日发生的多个大学上万人涌入北大寻衅事件的背景，便至今也没有揭示出来。

仅就北大武斗本身而言，最初是小规模的肢体冲突，后来逐步升级，最终发展为动用长矛等武斗工具的较大规模的两派战斗。

下面，我将对北大武斗发生的政治背景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按时间顺序，叙述一下北大武斗发生、发展的主要脉络，顺便对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四位校友在《记忆》第172期和《燕园风云录》所刊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北大武斗的政治背景

笔者以为，北大武斗发生的政治背景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北京高校分裂成两大派，在革命的口号下相互争斗，甚至武斗，这是王、关、戚的挑动和中央文革操纵造成的。吴德在其口述回忆中就说：“……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¹吴德的这段话，足以证明当年北京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本身疑团重重，有许多黑幕至今没有揭开。至少，平民百姓是不知道的。在这些扑朔迷离的疑团和重重黑幕背后，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对此，笔者所知极其有限，只能从表面上来探讨了。

聂元梓等人虽然也左，也犯过许多错误，但相对地保持着一点清醒的头脑。根据周总理指示，聂元梓派北大师生去教育部夺权，在这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成了某一团伙的绊脚石，关锋、王力亲自出面打电话，不顾自己中央文革大员的身份和“左派”形象，竟然用无中生有的谣言打压北大，这不能不使聂元梓、孙蓬一产生警觉。所谓“二月逆流”，本来是中央高层内部的事情，群众毫不知情。但王、关、戚一伙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群众中挑动事端，企图为自己的团伙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实现他们的野心。新北大公社总部在聂元梓、孙蓬一的支持下，在这场风暴中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以至于被骂为“二月逆流派”、“全国最大的保皇派”。从“反陶铸”、“一月夺权”、1.15抢档案事件，直至以“反二月逆流”为名企图打倒几位副总理，并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的一系列事件中，王、关、戚一伙肆无忌惮的活动，暴露了他们自己。4.8民族宫事件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这种形势下，聂元梓、孙蓬一于1967年4月10日面见江青、陈伯达反映情况，明确指出关锋、王力“结党营私”。聂、孙入党多年，党内斗

¹《吴德口述：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争经验比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学子丰富得多，他们的观察力也比我们敏锐，因而比我们更能看出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聂、孙此举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是非常不容易的。公开反对关锋、王力，无疑以卵击石，聂、孙和新北大公社只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吴传启、洪涛、刘郢这一伙人。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也遭到了王、关、戚这个团伙的深刻仇恨，他们在暗中策划，在北大校内校外，组织各种力量企图扼杀这一斗争，必欲拔去北大这颗钉子而后快。1967年5月28日，陈伯达、关锋、王力还以“合作”为诱饵，要聂元梓放弃揭发吴传启。聂元梓断然拒绝了这种“合作”，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于6月1日贴出了揭发吴传启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聂元梓居然不听话，还敢于对抗，于是，王、关、戚和他们的后台愤怒了，震怒了，要对北大采取措施了。为了给关锋、王力解围，也使中央文革摆脱被动局面，陈伯达的6.5讲话出炉了，陈伯达无端指责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在陈伯达讲话的煽动下，北大大乱了，对于策划已久的某些人来说，“倒聂”的机会来了。对于吴传启、洪涛、刘郢、王恩宇这个团伙来说，他们策划已久的搞乱北大、保护自己的机会来了。顺应关锋、王力、吴传启、洪涛一伙搞垮北大的意图，井冈山兵团诞生了一一这是1967年春夏北大文革的主要脉络。我在《谁之过》一文中已详细地叙述了井冈山兵团成立的过程。现在井冈山方面的某些人极力回避这一点，甚者说自己和王、关、戚“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但是，历史事实摆在那里，回避、无视、掩盖，等等，都是徒劳的。

第二，谢富治包庇纵容1.15抢档案事件的主犯洪涛、刘郢，在市革委会里大量任用王、关、戚安插的亲信。在处理4.8民族宫事件北大和地院两派纷争时，谢富治又偏袒地院，指责北大。这当然引起孙蓬一的不满。孙蓬一是有名的“大炮”，过去一些事件，他隐忍下来了，4.8民族宫事件，也忍住了，后来别人打上门来，忍无可忍，4月12日向吴传启团伙放了一炮。4月13日谢富治的拉偏架的态度，再次让他无法忍受，在群众集会上将谢富治召集会议的情况如实报告，于是引发了一场“炮打谢富治”事件。王、关、戚一伙贼喊捉贼，借此将“聂元梓要夺谢副总理的权，要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扣在聂元梓头上。

现在，谢富治的罪行被揭露了，关锋、吴传启一伙从一开始就把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各要害部门的罪行败露了，如吴德所回忆：“（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多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涂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¹吴德的回忆很简略，但揭露的事实触目惊心。现在，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见诸史书了，“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委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²谢富治同王、关、戚实际上是一伙的，王、关、戚垮台了，但谢富治还在执行王、关、戚的路线，对聂、孙和新北大公社继续实施打压。想当初曾经高喊“誓死保卫谢副总理”口号的人，如今却180度大转弯，居然又说“谢富治是聂元梓搞3.29武斗的后台”了。³这正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最好例证。

第三，1968年3月在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联合举办的高校学习班上，出现了要求清算王、关、戚罪行的呼声和反对谢富治的意见。中央文革心中有鬼，因为王、关、戚曾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害怕这种清算会追责到自己身上，竟不顾事实，硬把这些要求和意见诬为“为二月逆流翻案”，用高压手段进行打压。从3月15日起，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以整风为名，大整聂元梓。而聂元梓则提出“谢副总理第一个要整风”。气急败坏的谢富治便组织众多力量，在全北京市批判聂元梓，对北大等校进行打压，要拔掉聂元梓这根刺。这时又发生了“杨、余、傅事件”。这本来是军队高层内部的事情，与群众组织无关。这一事件的起因扑朔迷离，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在当时，中央文革却移花接木，硬把这一

¹《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36—37页。

²见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第611页。

³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载《燕园风云录》（三），自印本，2014年12月，第14页。

事件和当前群众组织反对王、关、戚的事情拉在一起。原来对于王、关、戚问题，中央文革一向是采用鸵鸟政策，讳莫如深，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不但大批王、关、戚，说他们是“变色龙”、“小爬虫”，还说杨、余、傅是王、关、戚的后台，并借此又掀起了一个新的“反二月逆流”的高潮，对反对王、关、戚的群众组织实施打压。3月24日林彪讲话指责“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还提到了聂元梓的名字，言外之意，似乎聂元梓与杨、余、傅有什么黑关系。在这种气氛下，第二天就有人组织地派多个院校上万人闯入北大校园，企图挑起大规模冲突，把对北大的围攻推向了高潮。这个事件，显然有着很深很黑的背景。有人深怕北大没有武斗，只要发生武斗，就可以将全部罪责扣到聂元梓头上，将聂元梓这根刺拔掉。幸好新北大公社采取了克制态度，聂元梓又逼着谢富治到北大讲话，命令外校学生退出北大，这才避免了一场惨祸。挑起3.25事件的人当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对新北大公社而言，却是压力很大。

以上，就是北大发生武斗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

二、对北大武斗的简要回顾

以下，笔者对北大1968年发生的几起武斗事件略作回顾。

首先需要声明：下文引用的一些资料，其真实程度，笔者现在已没有能力去一一核实，如果有误，希望知情者不吝指正，并作补充。此外，引用的材料中有“牛辉林之流”一类的派性话语，现在本不应该再使用，但原文如此，难以一一删节，敬请读者谅解。

1. 1968. 1. 16 井冈山攻打38、41楼，“我们正在办公楼礼堂看节目，林红突然来叫我们，说井冈山趁公社在办公楼礼堂看节目，冲进了我们38楼，将我守楼站岗的战士当即打昏过去，抢走了楼上的三个喇叭，又冲进41楼，在五楼打伤我多名公社值班战士，公社红11战团要求我们立即回去，给井冈山以坚决还击。”¹

¹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1页。

2. 1968. 1. 16 校文革办公室《通告》称：井冈山兵团的“暴徒抢夺了校文革大印”。¹

3. 1968. 3. 17 “北大井冈山牛辉林之流唆使一小撮暴徒，抄了工人刘宗山的家，并于夜间十点到十二点，包围煤场，挑起武斗。”²

4. 1968. 3. 20 深夜，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院东方红组织群众到北大示威游行，井冈山兵团也内应组织示威。游行示威中高喊：“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等口号。³

5. 1968. 3. 21 “三月二十一日晚，北大井冈山兵团牛辉林之流大打出手，抄了同陆平黑帮进行了长期斗争的革命左派孙蓬一同志、陈葆华同志的家，残酷殴打校文革常委陈影同志，又去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革命左派夏剑豸同志的家，未能得逞。同时，牛辉林之流还抢砸了地质地理系文革办公室，劫走全部档案材料；抢砸了北大汽车库，劫走汽车一辆；割断了新北大广播台全部喇叭线，抢走十七个喇叭，烧毁十一个喇叭。”⁴

6. 1968. 3. 22 井冈山兵团总部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1000多人来北大游行，呼喊“打倒孙蓬一”、“揪出聂元梓”等口号。⁵

7. 1968. 3. 22 “1点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向大家传达了会议上的发言（指市革委会扩大会议，谢富治等批评聂元梓的发言）。‘井’在此前已传达并敲锣打鼓地进行游行。高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孙蓬一。’‘井’大搞打、砸、抢，把我们十多个喇叭都搞掉了。”

6

8. 1968年3月22日，公社总部召开会议，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经会议分工，由宫香政、黄树田、黄元庄三位同志负责。并提出“绝不先打第一枪”的原则。

.....
¹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7页。

²《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载《新北大》增刊 1968年3月30日

³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8页。

⁴《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载《新北大》增刊 1968年3月30日

⁵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8页。

⁶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6~297页。

9. 1968. 3. 23 新人大公社等六个造反组织到北京市革委会示威，并发表《声明》“打倒聂元梓、孙蓬一”，“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¹

10. 1968年3月25日，“下午四点十分，北大井冈山牛辉林之流伙同××学院东方红突然袭击新北大广播台。四点三十五分，××学院东方红、××学院延安公社、××学院造反团、××大学东方红等组织大约二千多人相继来到北大，他们头戴柳条帽，手拿大铁棍。尽管我们给××学院东方红等组织发出照会，希望他们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是，他们仍然向新北大广播台发起新的冲击，……”²

当晚7点左右，谢副总理、吴德同志、丁国钰同志亲临新北大，在新北大广播台作重要广播讲话。“谢副总理在讲话中，完全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希望公社和井冈山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实现革命大联合。谢副总理说，新北大公社给他提意见，他热烈欢迎，同时严厉批评井冈山，不应该提出誓死保卫谢副总理。谢副总理说，那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庸俗的，他也是从来就反对的。”³

11. 1968. 3. 26 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闯进北大，发生武斗。⁴

12. 1968. 3. 29 凌晨1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100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严重损失。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赶到武斗现场，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要求两派各派五名代表“由校文革、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李钟奇说：“我今天到现场制止武斗时，有人拿匕首刺伤了聂元梓”，要求全校动员“把凶手抓起来”。⁵

13. 1968. 4. 19 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钻进北大图书馆，被公社巡逻人员发现后，殴打致死。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14. 1968. 4. 25 “下午1点半井冈山一百多人全副武装进攻36楼女生宿舍，挑起大规模

¹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668页

²《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载《新北大》增刊 1968年3月30日

³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14页。

⁴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69页。

⁵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69页。

武斗，破坏我积代会。我公社战士英勇奋战，伤者四五十人。解放军表态，井冈山占领36楼挑起武斗是错误的。”¹

15. 1968. 4. 26 孙蓬一擅自指挥公社成员，攻打已被井冈山占领的36楼，由于井冈山有充分准备，公社战士仓促上阵，很多人被打伤，高云鹏跑到现场劝说孙蓬一后，停止了进攻，撤下了公社的人员。

4. 26之后，井冈山成功实现了从28楼经过37楼出入学校的安全通道。后来又架了天桥，挖了地道。此后，井冈山又放弃了19、20、21楼，把人员集中到28楼至37楼控制区。这样，就自然形成了公社对井冈山东西两侧的包围态势。根据这一变化，公社总部又开会作了分工，西线由宫香政负责，东线由黄树田负责。自此，才有了“东线”、“西线”之说。

16. 1968. 4. 27 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总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²这是犯罪行为。针对这种犯罪行为，我曾在办公楼大会上公开表示反对，我说：“优待俘虏，是我们党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优良传统。有的人在战场上不能冲锋陷阵，而抓着对方人员却往死里打，这不是英雄行为。”后来，听说刺死殷文杰的同学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17. 1968. 5. 2, “井冈山总部不是省油的灯，36楼保卫战大捷冲昏了头脑，不顾劣势，轻举妄动，竟然要主动招惹新北大公社。5月2日，派我们03纵去38楼出击抢木板床！……在撤退的指令下，我们还没有和对方交上火，就溃不成军，逃了回来，这一次损失惨重，许多人受伤”。³

18. 1968. 7. 20 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⁴当我得知刘玮被打后，

¹孙月才：《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5页。

²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第670页。

³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gd/lsgj/article_2012022254193.html

⁴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2页。

从公社总部打电话，请校医院赶快派大夫来救治，舒会文大夫到现场检查后说，为时已晚。这种犯罪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刘玮之死实在让人痛心。

19. 1968年7月22日晚上，在“井冈山”武斗指挥部梁清文（地球物理学一年级）和孔易人（哲学系五年级）等人的调度指挥下，守楼的人员，手持长矛，从各楼由地道摸黑向37楼集结，部分人员身上装着燃烧瓶。在37楼朝南的各个窗口，都装上了强力弹弓。……他们把木床架到了马路上，在床前方洒上了致滑的黄豆和绿豆，在床上架上了弹弓，人则持长矛守候在木床旁，严阵以待对方的冲击。……“校文革”、“公社一方”，看到了这个情景，他们也很快做出了反应。训练有素的长矛队分别从34楼和40楼东西两方面向中间夹击，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便在马路上展开了。……在此同时，“井冈山”在28楼却奇袭了“公社”的后方。几个人先是用铁棍扔到对方裸露的电线上，企图造成短路，未果。后来改用铜丝漫洒下去，连搭在几根电线上，于是，火光一闪，全校电线都短路了！顿时，燕园里一片漆黑，“公社”广播台哑然失声。时隔不久，接电成功了，“井冈山”上灯火通明，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井冈山广播台立即播放了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霄遁！”……并且激奋昂扬地播送了早已准备好的庆祝文稿。2（？）

20. 1968. 7. 24 “今天晚上，……北大还是发生了武斗。双方使用了燃烧弹和各种自制的新武器，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公社说井冈山困兽犹斗，灭亡前的垂死挣扎，目的是为了明目张胆地破坏毛主席亲自签发的《7.3布告》和《7.24布告》。井冈山说公社为了最后消灭井冈山，发起最后攻势，是对毛主席亲自签发的《7.3布告》和《7.24布告》最恶劣的破坏。”“两派高音喇叭正在对骂，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地派，开着一辆辆喇叭车，围绕着北大围墙外的马路游行，打的是宣传《7.3布告》和《7.24布告》，却公开宣称坚决声援井冈山反饥饿、反迫害、反围剿，愤怒讨伐聂元梓‘血腥屠杀井冈山兵团的罪行’。农科院红旗兵团的宣传车，胆敢闯入北大校园，当即被公社将人车一齐扣下，为他们办学习班，向他

们宣传《7.3 布告》和《7.24 布告》，不低头认罪就不放他们。”¹

21. 1968. 7. 27, 上午得知, 数万人包围了清华, 听说还打起来了, 有人受伤了。公社马上派人送开水去慰问工人, 同时打探消息, 但是, 工人们口风很紧, 一无所获。聂元梓给市革委会打电话没人接, 找谢富治、吴德等人都找不着; 给中央文革打电话, 没有人接, 看来上层封锁了消息。又听说, 7. 28 农代会要来包围北大, 不知如何是好。校文革和公社总部立即召开了联席会议, 商量对策, 大家一致同意, 由聂元梓给毛主席发加急电报, 进行请示。当晚我值班, 28 日凌晨 3 点左右, 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 要聂元梓 4 点到人大大会堂西门。我赶紧派人通知了聂元梓, 并把这一消息告知了其他同志, 大家都认为, 中央可能有新的重大决策。

22. 1968. 7. 28 早晨, 公社的很多同学都集中在公社总部, 等待聂元梓回来。聂元梓回校后, 立即传达了毛泽东召见的内容, 大家感到如释重负。我非常高兴, 心想, 北大漫长的武斗要结束啦, 该是“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的时候啦。

针对这一新情况, 公社总部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 向大家提出三点要求:

- 一、准备迎接工宣队进校;
- 二、坚守岗位, 提高警惕, 防止井冈山偷袭;
- 三、逐步拆除武斗工事, 清点武斗工具, 准备上交。

23. 1968. 8. 19 63 军的军宣队和北京二机床、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宣队进校。

24. 1968. 8. 20 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交武斗工具, 据校文革“情况反映”统计, 有扎枪、长矛 930 支, 安全帽 518 顶, 护身甲 336 件, 铁棍约 200 根。

25. 1968. 8. 21 晨, 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 计有: 长矛 749 根, 铁棍 71 根, 护身甲 208 件, 柳条帽 432 顶, 弹弓 8 个, 小口径子弹 37 枚。(井冈山兵团手里居然有子弹, 这是我没想到的。)

以上, 就是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过程。

¹陈焕仁:《红卫兵日记》,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547 页。

回顾北大武斗的过程，我认为：

北大武斗由小到大，由肢体冲突发展到动用武斗工具的大规模的冲突，有一个发展过程。随着形势的加剧，双方都进行了准备。这是当时北大两派斗争激化所造成的。而且，北大两派矛盾的激化，有许多外来的因素。

北大发生分裂和武斗的政治背景，笔者在上文已作了说明。主要就是王、关、戚的挑动和中央文革的操纵，没有他们搞鬼，北大不会如此分裂，也不会发生武斗，最多是派别林立，打嘴仗、笔仗而已。关锋、王力垮台，高层讳莫如深，更谈不上对关、王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补救措施。没有是非，没有原则，也就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对于反对王、关、戚的群众组织，继续实行打压政策。68年春，校内外对新北大公社的围剿更是加剧，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见聂必批”，公社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加强凝聚力，公社举办了“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地点在俄文楼，我是学习班负责人之一。

利用江青对孙蓬一的不点名的批评，井冈山派人去二七厂（孙蓬一的家）抓孙蓬一，扑了空，但是，却吓坏了他的老岳母和年幼的孩子；在校内，孙蓬一遭到围殴，被公社的同学解救了；在市革委会，谢富治组织人整聂元梓，高喊“聂元梓滚出市革委会”；又有消息说，井冈山从校外运进了一批武斗工具。公社总部感到形势很严峻，所以就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会议议定，公社应准备一支队伍，随时可以调动，以应对紧急情况发生，为此，决定二期学习班的男同志集中在二体住宿，并让孙蓬一住进二体，予以保护。在此期间，公社成员利用学校工厂的材料制作了一些长矛和护身甲，买来一部分柳条帽。

后来，随着形势进一步加剧，三月二十二日，公社总部才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我是主要成员之一。公社总部的原则是“绝不先打第一枪”。即使在3月25日地派万人涌入北大校园寻衅，甚至要砸广播台那样的紧急关头，公社也没有出动队伍，而是三令五申，要求公社成员不要与校外人员发生冲突。只是在3.28晚上，井冈山武力驱赶40楼公社的同学后，为了扭转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公社才出动队伍于深夜去争夺31楼的。

现在一些原井冈山兵团的人，写文章说他们对武斗毫无准备。或许，他们属于不知情的那一部分人，但牛辉林的遗作《我和周培源校长》，是承认双方都有准备的。他写道：

市革委的学习班结束后，北大校园中大规模武斗的气氛越来越浓。对立双方都在加紧准备各自的武斗队伍和武器装备（长矛、棍棒、大弹弓等）。我们“井冈山”总部也搬进了自己一派占据的28号楼。因周校长的身份不宜武斗前住进武斗据点，就仍然住在燕南园的家里。

那时，我担心万一大打起来、老人家有个闪失不得了。……3月25日晚用统战部朋友的车，由我秘密护送周老去了别墅。¹

三、关于3.28-3.29武斗的详细过程

3.28-3.29武斗的详细过程是：3月28日晚饭后，公社总部接到报告：井冈山兵团在40楼动用武斗工具驱赶公社的同学。于是，公社头头在总部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议中，大家分析形势，认为：28楼已被井冈山占据，31楼里井冈山的人员较多，他们又从校外运进了一些木棒、铁棍等武斗工具。如今，他们又要占据40楼，是想控制西南校门，开通与校外“地派”联系的自由通道。而28楼和31楼是学生宿舍核心区，井冈山一旦占据了28楼、31楼和40楼，那么，公社一派在宿舍区将无立足之地，局面是非常危险的。面对这种危险局面，我们不能被井冈山牵着鼻子走，为了打乱井冈山的计划，我们不与他们去争夺40楼，我们必须占据31楼，才能稳住阵脚。尔后，立即召开了战斗团长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讲了对策。当时，化学系的红三团团团长觉得非常为难，最后，经过大家激烈讨论，红三团团团长勉强服从了大家的意见。为了不让化学系的公社同学为难，分配他们在楼外防守井冈山的进攻。当时，公社一方准备了部分长矛、护心甲和柳条帽，但没有配发像井冈山个别校友所说的黄色军棉袄，白毛巾是临时发的，不够则用白布条代替。当晚11时

¹从璋等：《燕园风云录》（四），自印本，2016年，第121页。

过后，公社开始夺占31楼的行动，这就是3.28-3.29北大武斗中公社一方全部过程。

在一些井冈山校友所写的回忆文章里，总是说“3.28—3.29”武斗是公社挑起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时间上来看，40楼里公社成员被驱赶在先，31楼争夺战是在其后。如俞小平先生在《记忆》第152期所述：“不仅31楼，40楼也打起来了，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新北大公社的系级组织为“战斗团”，西语系的新北大公社组织称为“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团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28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由此可以看出，“3.28”井冈山兵团在40楼的武斗行动是预先有准备的，还有其他纵队支援，是一个跨系行动。显然是动用了武斗工具，正因为井冈山人员动用了武斗工具，而红10团人员赤手空拳，所以才被抓走了30人。

陈子明、林爻在《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向背——兼与宫香政商榷》一文中推荐了多篇文章，有一篇散淡天涯的《北大“3.29武斗”印象》，其中写道：

1968年3月28日，武斗前夕，大约傍晚时分，井冈山五一纵队在40斋召开会议，主持者通报了一些两派斗争的情况，说已经发生了井冈山兵团人员被抓走的事件，告诫大家以后不要到未名湖散步了。尤其强调说“新北大公社那边准备了铁棒、长矛等武斗工具，分发了白毛巾准备绑在胳膊上作标志”，看来一场死战已经在所难免。要求我们当晚就将自己宿舍里的公社派同学赶出去。组织了一些男生寻找铁棍制作武斗工具，还派人去摘掉公社派的高音喇叭。¹

请注意时间节点。散淡天涯说的是“大约傍晚时分”，井冈山人开始布置，“要求我们当晚就将自己宿舍里的公社派同学赶出去”，这和我们接到的报告“井冈山的人驱赶在40楼里居住的公社的同学”是一致的，也和俞小平写的“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团

¹散淡天涯：《北大“3.29武斗”印象》，载丛璋等编：《燕园风云录》（一），自印本，2012年，第162页。

团长都被俘”这一段可以互相印证。由于公社方面没有理会40楼，而是去夺取31楼，因而住在31楼的井冈山人措手不及，吃了亏。所以，现在井冈山校友写出的许多文章，大多只谈公社夺占31楼，而回避了井冈山在40楼首先挑起武斗的事实。

公社的行动打乱了井冈山原有的计划，40楼与28楼相距甚远，仅靠占领40楼也无法控制西南校门，所以井冈山就放弃了40楼。

需要说明的是：决定夺占31楼的事情，就是新北大公社总部的几个负责人召集会议决定的，没有校文革的人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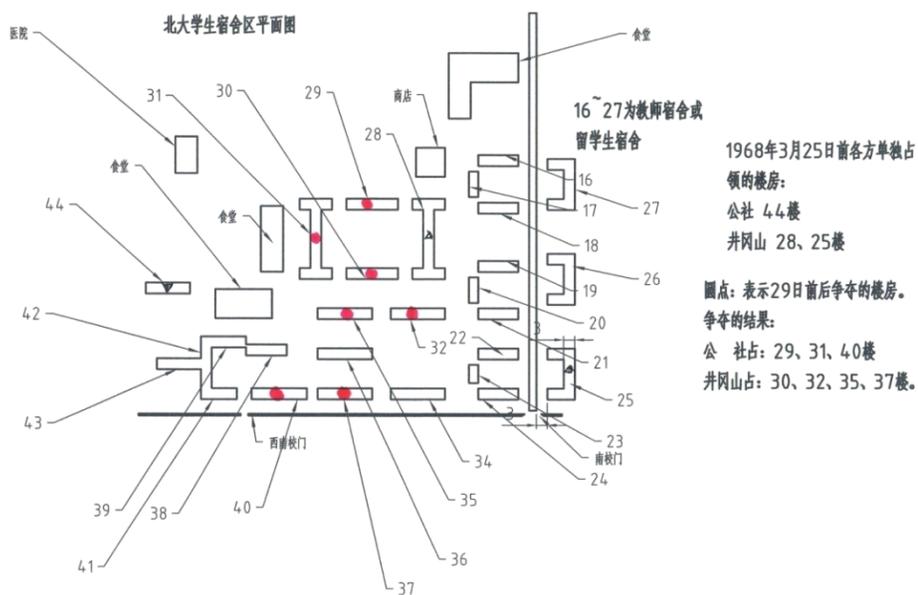
“3.28-3.29”武斗后，公社一方并没有包围井冈山的意图。当时，双方可以自由去食堂就餐、去校医院就医，在一些楼里双方同时居住，如41楼就是两派同住的。3月29日夜，趁我上厕所不备之际，原井冈山未上任的组织部长何发信同学还打了我一巴掌，双方吵了起来。我有条件把他抓起来，但是，我没那样做，毕竟是多年的同学，所以就不了了之。

“3.28”之前，井冈山在校园里用大喇叭天天喊叫“打倒孙蓬一”、“聂元梓下台滚蛋”、“一切权力归井冈山””并通缉孙蓬一。校外地派也不断派人闯入北大搅局，给井冈山打气助威。公社和校文革压力巨大，非常被动。当时，井冈山成员可能认为：孙蓬一完蛋了，聂元梓在市革委会挨整，气数已尽，新北大公社也快散摊子了。所以，当时井冈山的成员很有些沾沾自喜、胜利在望的劲头。

但是“3.28—3.29””斗后，公社打乱了井冈山的计划，地派院校也不敢再冒然派人闯入北大搅局。虽然双方大多数人员可以自由行动，但是，在武斗气氛浓烈的情况下，双方骨干成员是不敢到对立面控制区走动的。特别是井冈山的负责人和一些骨干成员，由于他们放弃了40楼，没有了出入学校的自由通道，极度缺乏安全感。为了获得安全感，为了打通一条出入学校的通道，所以，就有了4.25井冈山进攻36楼的武斗行动。

“3.28-3.29””斗后，双方交换过俘虏。因我忙于31楼防守工作，没有参与此事。

为了使读者了解当时的形势，这里给出北大学生区的形势图。3.29以后，井冈山方面占28、30、32、35、37楼。在35和37楼中间有36楼，36楼中是两派合住，是女生宿舍。



武斗期间，公社一方个别人失去理智，打死了校内外的三位青年学生，这种事情无疑是极其错误的，面对这些不幸事件，公社总部全体负责人都心痛不已。这种事件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只能责怪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好所有人的情绪，但并不存在事先策划、指使、授意的问题。

四、关于高云鹏老师有关情况的说明

高老师是在“3.28-3.29”武斗之后由校文革派到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来的。因为我们青年学生容易冲动，而高老师办事稳妥，让他来给我们把把关。他没有参与过一次武斗决策或指挥。4.26他去现场劝阻了孙蓬一，停止了武斗。

我曾向他问起谣传他在陕西被捕并几乎被枪毙一事，他亲口对我说，迟群、谢静宜、魏银秋之流企图利用“刘玮事件”将聂元梓置于死地，对高老师施加各种压力和诱惑，先是诬陷高老师是汉中武斗的后台，迫使陕西省革委会将高老师逮捕入狱。魏银秋亲自跑到陕西找高老师谈话，高老师回忆说：有一个要我回忆的事件最具代表性。魏银秋启发我很久我都没有理解，后来他干脆告诉我：只要我配合他们搞清一件事，明天就能放我出去，

而且说他说话是算数的，是说不二一的。他要我说的就是40楼打死一个井冈山学生（刘玮）的事。情节要按他说的来“交待”，即头一天晚上，校文革在临湖轩开会，我参加了，会上老聂决定第二天工人兵团到海淀镇去抓人。被打死的人就是这样被抓住打死的，事件是老聂策划的。我告诉魏银秋，我所知道的情况跟他让我交待的情节完全相反，……我拒绝写这样的口供。

高老师坚持实事求是，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而对聂元梓落井下石，魏银秋见企图未能得逞，就对高云鹏下了毒手，他对陕西省革委会的人说，“这种顽固分子还留着有什么用？”，言外之意是让陕西省革委会赶快将高云鹏枪毙。但是，陕西省革委会中原公检法的老干部很慎重，他们认为，如果将高云鹏不明不白地枪毙了，毙对了是魏银秋的功劳，毙错了是陕西省的罪过。后来，经过深入调查，诬陷高老师的所谓“汉中武斗后台”的重要证据被否定了，于是，不得不宣布“高云鹏无罪释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迟群之流是多么阴险毒辣、不择手段地草菅人命。为什么要置聂元梓于死地？是谁的旨意？这背后的黑幕至今没有揭开。

高云鹏受到迟群等人的残酷迫害长达十年之久，但始终坚持了做人的底线——不陷害别人。如今，年届八旬的高云鹏还健在，还在为祖国的心理学事业忙碌着。高云鹏早已读过井冈山人写的关于北大武斗的相关文章，他谅解那些不知情的学生所写的关于他的不实之词。但我对那些至今仍将迟群一伙的诬陷之词往高云鹏头上扣的行径难以理解。

五、几个问题

这里就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1. “俞文”引用了笔名为“田老兄”的一段文章说：“3月28日下午……许多同学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又说“晚8点，公社头头xxx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大家要有准备’……‘其实他心中大概早已有数’”。

“田老兄”自称住在31楼，31楼是两派混合共住，公社头头怎么会去“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公社的头头是谁？是哪一级的头头，公社总部头头里没有化学系的人，外系的头头不熟悉31楼的情况，如何去“挨室告诉”？走错了门，不被井冈山抓走了吗？显然逻辑上是不通的。“3.28”武斗由井冈山驱赶40楼公社同学引起，公社总部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谁也做不到心中有数，“挨室告诉”的事也不会发生。田老兄的话纯属臆造。

2. “俞文”引用了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中的如下资料：

“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3月28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

俞小平等人根据艾群提供的这个“询问笔录”，就认定“聂元梓是北大武斗发起方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聂元梓必须、而且已经为她的策划领导武斗及武斗中的人员伤亡负刑事责任。”

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给聂元梓的刑事判决书中，根本没有和武斗相关的内容。

我在《燕园风云录》(四)中，读到了艾群的这篇文章，该文失实之处甚多，本文暂不讨论，只就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稍作探讨。

请问艾群，“聂元梓在司法机关询问笔录”是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情况下的笔录？该“笔录”多大的真实性？是不是逼、供、信的产物？你引用的是询问者的话？还是聂元梓回答的话？聂元梓本人有签字吗？如此重要的证据，如果你有复制件或全文抄录件，请你将其公布出来，让读者来分析判断，而不是用片言只语，以讹传讹。

当时我是总指挥之一，校文革和公社的一帮头头们到临湖轩去找聂元梓、要求武力解决问题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样的会起码我应当参加，而我不知道有这个会议，更谈不上我参加这个会议了。当时北京市举办高校学习班，聂、孙多数日子住在会上，有时

回校住。聂回校住 44 楼，孙住在二体。当时井冈山高喊“打倒孙蓬一”“聂元梓下台滚蛋”“一切权力归井冈山”口号，并且通缉孙蓬一、围殴孙蓬一，气氛紧张。临湖轩远离学生区，是一座孤立的建筑，聂元梓一个人敢住在那里吗？校文革和公社的一帮头头，深更半夜的敢在那里开会吗？如果这个会议是确凿无疑的，对聂元梓如此不利的事情，《北京大学纪事》怎么会没有收录呢？这份“询问笔录”否与 8341 宣传队的魏银秋逼迫高云鹏作伪证同出一辙呢？或者，这是逼、供、信的产物？

另外，艾群在文中还说，公社一方给井冈山“断电、断水、断粮、断炊”此话不实，断电是有的，为了不让井冈山的大喇叭叫唤；断粮、断炊没有，北大的大饭厅对两派一直开放，号称数千人的井冈山若断粮、断炊得饿死多少口子？断水更没有，连小孩都知道人离开水活不了三天，我想艾群同学应该有这个常识

3. 俞文中说：“公社武斗队员被井冈山俘获，是在井冈山的自卫中发生的”，这和他在《记忆》第 152 期中所说的自相矛盾(上文已引，此处不赘)，毫无准备的“自卫”能抓 30 多名公社的同学吗？

4. 陈、林二位在文中，对井冈山以武力占领 32 楼，说成是“对立派同学平和让出了 32 斋”。

试问，在武斗气氛极浓的情况下，说公社的同学“平和让出了 32 斋”，可能吗？既然是“平和让出”不是“被打走的”，为什么他们的衣物和用品都拿不出来？

当年住在 32 楼的丁大可同学在回忆里是这样说的：

1968 年 3 月 28 日深夜，听到校内有点乱哄哄，便赶忙出来看看情况，场面挺混乱。看了一会感觉无趣，就想回宿舍。没想到 32 斋门口已有人把守，并且说，非井冈山人不准进，东西也不准拿。29 号早上李钟奇来北大，心想这回问题可以解决了，就赶忙去听他讲话。没想到情况更为严重，32 斋宿舍是回不去了。由于没有宿舍会被井冈山占领的预兆和思想准备，所有生活用品，包括衣服、一个老怀表等，都拿不出来了。听我们系有的人讲，当井冈山人冲进来时，64 级一个同学（他没有参加井冈山）是从二楼窗户跳下来的。本来

我们系就没有绝对的公社铁杆，大部分是懒得从原校文革体制下出来的半逍遥派，听到64级同学跳楼的事，当然就更不敢回32斋的宿舍了。

这才是井冈山占领32楼的真相。还有30楼，35楼，37楼，井冈山又是怎样占领的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5. 有井冈山的校友在《燕园风云录》的文章中说，“北大的3.29开创北京高校武斗的先河”。这是无知还是假装无知？中央民族学院1967年2月发生武斗，北京钢铁学院1967年秋发生武斗，人民大学的武斗也发生在北大之前。1967年4月8日“民族宫事件”，轰动北京，震动天庭，算不算武斗？即便如此，谢富治仍然把责任推到北大头上。1967年4月11日，6所院校到北大来寻衅，打了北大的同学，撕烂了他的衣服，这算不算武斗？打上门来，是不是欺人太甚？孙蓬一忍无可忍，才有了4.12讲话，但他并没有把那些群众组织当成敌人，矛头指向的是王、关、戚一伙。只见外校的人屡屡来北大寻衅，新北大公社何曾派人到别的学校去挑衅过？

6. 俞小平先生在文中引用了一些北大师生受到迫害的控诉文章，其目的是控诉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罪行”。这些受到迫害的干部、师生，他们的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是值得同情的。但这证明不了井冈山是正确的。我没有看过郑培蒂老师的回忆录，但从俞小平引用的部分文字中，我没有发现郑老师是被聂元梓授意批斗的，也没发现是聂元梓把她关进牛棚的。从文中可以看出郑老师是一位活跃人物，是井冈山骨干成员，她声称“他们必须打倒我来削弱井冈山的势力”，她一个人居然关系到整个井冈山的势力，俨然是以井冈山要员自居了。但当郑老师被揪斗时，你们井冈山的人干什么去了？季羨林先生也被公社揪斗过，他还是你们的纵队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予以保护呢？这两位要员都在牛棚里，你们为什么没有去解救他们呢？因为，你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有问题，所以，连一纸保护他们的声明都没有发表，就把他们抛弃了，甚至也进行揪斗。

请看季老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是怎样说的吧：

我被公社“打倒”了，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自己的红卫兵，到

我家来，押解我到属于井冈山的什么地方去审讯。他们是一丘之貉，难兄难弟。到了此时，我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最让我难以理解也难以忍受的是我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烈属”人，简直红得不能再红了。学习得并不怎样。我为了贯彻所谓“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我的助教。还有一个同他像是“枣木球一对”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我在课堂上给他吃偏饭，多向他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我成了“阶级报复”。就是这两个在山（井冈山）上的人，把我揪去审讯，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我的耳朵。我真是哭笑不得，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奈之何哉！这一位姓马的“烈属”屡次扬言：“不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金童玉女！”然而狐狸尾巴是不能够永远掩盖的。到了今天，这一位最理想的革命接班人，已经背叛了祖国，跑到欧洲的一个小国，当“白华”去了。¹

不知俞小平先生，看了季老先生这段话，有何感想？

7. 俞小平先生在文中说：“在文革结束后，井冈山成员没有一个被判刑或定为‘三种人’，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罕见的。”俞小平先生想以此证明井冈山是正确的一方。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文革后在北大进行的清算，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倾向，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不想细说。

8. 俞小平先生所提及你们班上W男和L女的事，我毫不知晓，没有发言权。

六、结束语

“自古知兵非好战”，文革中北大的全体师生没有一个人天生爱打架的。但是为什么斗得你死我活呢？那是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路线斗争不可调和”的理论武装了派性，派性绑架了理性，致使两派成员斗的你死我活。文革中北大所发生的长达几个月的武斗，

¹季羨林：《牛棚杂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第69—70页。

是北大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场闹剧。是令人痛心的。

我在北大武斗中是有错误的，对不起两派校友。但是，我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没有上台批判过所谓“陆平黑帮”，没有揪斗过老师，没有陷害和批判过同学，没有策划或指使任何人去抓捕井冈山的同学，我也没有亲自抓捕过井冈山的同学。原技术物理系化三的张从同学在《记忆》第114期的文章里说，郭箐荅用“直觉”判定是宫香政抓了他，这纯属捏造。唯一使我感到内疚的是：我对不起井冈山化二的袁克强同学（我中学的师弟），“3.28——3.29”之后他找到我，希望进入31楼取出自己的行李和用品，我没有同意，因为当时公社里许多同学的个人用品在井冈山占据的楼里也取不出来，大家很气愤，情绪很激烈。事后，我想起这件事，心里就难受，觉得很对不起袁克强，在这里借此公开向袁克强同学表示真诚的歉意。

聂元梓是北大文革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全国文革的一枚标签。聂元梓跟着共产党、毛泽东革命多年，文革中反对王、关、戚，本意也是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纯洁性，却不料为此得罪了某些人，且得罪之深，无从想象，无可救赎。从“第一张大字报”被捧到天上，到后来一再挨批，直至最后被扔进茅厕，表明她不过是一块石头，一件工具。文革中北大的分裂直至于武斗，都不是广大师生群众所希望的，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左右的，种种悲剧的发生，都说明了“阶级斗争”理论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现在回顾文革历史，我很赞同王若水先生的话，他说：“在回顾文革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脱离了当时的具体的历史大环境，当时的特殊的政治气氛，而以现在的眼光去要求那时的人物的言行。其实，许多现在看起来荒唐透顶的事，在那时却被相当普遍地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例如，要学生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不起来‘造反’，这是不现实的。”

回到原有的历史大环境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到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

我认为，抛弃派性，回归理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为研究北大文革历史提供真实

的材料，是我们这些亲历北大文革的人应尽的责任。

文革结束 40 多年了，我们再去争论往日两派的是是非非，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都是被人利用的工具（红卫兵）。想当初，我们是信仰同一个理论、崇拜同一个偶像、跟随同一个领袖，去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有不同看法，才分成两派的。两派斗争决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标榜自己是‘正义’的化身。



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现在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那段历史了。孔繁先生与聂元梓恢复了往日的友谊，用聂元梓的话说：“现在我们的关系很好”。

原井冈山兵团的灵魂人物郭罗基先生，几年前也从大洋彼岸向 90 多岁高龄的聂元梓表示了问候。牛辉林同学在 2008 年（上图：牛辉林与聂元梓，2008）看望了聂元梓，两人相谈甚欢，并合影留念。一些井冈山的同学也登门拜访过老太太，他们不再有原来的敌对情绪，释放出令人感到温暖的善意。这些都是令人高兴的。■

2017. 3. 10

【述 往】

1968年329北大武斗

——48年后的集体回忆

陈子明 樊能廷 韩长绵
华国藩 李国俊 姚建明
张 俭 朱开定

2016年12月9日中午，老同学们在“永远的03633”微信群中聊起北大1968年329事件，参加微信聊天的有陈子明、樊能廷、韩长绵、姚建明、朱开定，共计五位同班同学。李国俊没有微信，做了亲历简忆。为了核对情况，笔者与雷祯孝、李乾宽两位同学通了电话，给姚文德同学发了微信。兹将微信内容录如次，以“存史求真”

专门讲述北大329事件的材料可谓卷帙浩繁¹。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重当事人、尤

¹详见：戈 辰：《北大文革与文革风云回忆反思》，《燕园风云录·一》，2012年，215页。

范达人：《毛泽东遗弃文革红人聂元梓内情：发动武斗》，《凤凰视频》，2013年3月13日。

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昨天》第62期，2015年。

耿天彭：《关于“3·29”的回忆——1968.3.29被逼跳楼》，《新浪博客》，2007年3月10日。

顾仁虎：《北大武斗》

李竟然：《北大文革武斗纪实（摘自北大百年）》，《人人网

<http://blog.renren.com/share/257822079/425272003>》

理 胜：《忆北大文革旧事》，《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08期。

鸣不平：《我所见证的1968年北大武斗》，《海归网》，2007年7月12日。

散淡天涯：《北大329武斗印象》，《新浪博客》，2006年7月18日。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2009年，第7期。

唐 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ljsj/article_2012022254193.html》，2012年2月23日。

田建行：《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燕园风云录·一》，2012年，162页。

俞小平：《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燕园风云录·四》，2016年，78页。

张曼平：《我所经历的1968年北大武斗》 http://news.qiyeku.com/news_566869.html

其是第一现场当事人的叙述。署名发表本文的作者，都是第一现场当事人，其中多人签名亲书北大 1968 年 329 事件的亲历（见文后附图）。

先看李国俊的回忆：

发生在 1968 年 3 月 29 日凌晨的北大武斗，是聶元梓拍板¹，校文革及其属下“新北大公社”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目的是想摧毁北大“井冈山兵团”。聶元梓-校文革组建的武斗队可以说武装到牙齿，被夜袭的“井冈山兵团”骨干 03 纵队人员在睡梦中惊醒，赤手空拳应付对方的突然袭击。我们的宿舍在一楼，情急之中迅速地把两张床铺移到走廊竖起来抵档长矛，并加上一层棉被，处境十分被动。

当时，照明电已被公社武斗队提前切断，我们全力顶住床铺抵挡对方的猛烈进攻。记得我身旁还有一位外系的女同学，不知她什么时候和怎样进 31 斋的，黑暗中看不清她的面孔，真是一位勇敢非凡的女性。公社的人还把石灰包投掷到我们这边，幸亏没打到脸上。我们一直顽强抵抗至快到天亮，最后，我从房间的东面窗户跳出。公社武斗队的人从楼顶投下很多砖头砸我们，就是置我们于死地。天亮，我们无处安身，后来我年级井冈山兵团的一部分同学住进 37 斋。我们这些人在极其困难险恶的环境下，在楼里坚守了很长时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后，我们回到 31 斋宿舍，所有的财物被“新北大公社”的人洗劫一空，其中不乏贵重和珍贵的私人衣物。记得宣传队曾叫我们把被洗劫的财物写成书面上报，但上报后却一直没有下文。

1968 年的冬天，我是靠穿在身上的一件毛背心度过的，我是班上体格最棒的人，竟然没有冻出病来。69 年冬天，工宣队麻师傅把她爱人的一件油污磨得发亮的棉工作服借给我御寒，我离校前还给了她，滴水之恩无以为报，此乃终生憾事。记得她曾和我们讲过，“井冈山兵团”0363 中藏龙卧虎。时光在流逝，当年“井冈山兵团”0363 的人没有搞政治的，出不了龙和虎，一部分人出了国，留在国内的不少人成为专家教授。记得我赠樊兄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头两句是“悠悠往事脑常浮，卅一楼中御利矛。”就是指的 68

¹艾群：《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燕园风云录·四》，2016 年，194 页。

年3月29日由新北大公社发起的武斗。早在北大百年校庆，03633两派人已共同活动和合影留念，我是前年在韩长绵的劝说后才在贵州与昔日对立面一些人握手言和的。去年又北上，在京见到了在世的“新北大公社”的其他几位。正所谓世上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至于能否“相逢一笑泯恩仇”就另说了。

从李国俊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校文革搞武斗早有预谋和部署，不然，新北大公社几百人的武斗队要编练，统一的服装黄军棉袄、统一的柳条帽、统一的白毛巾、统一的长矛，一夕之间，如何办齐？他们切断31斋电源，手持长矛，石灰包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我们看看女同学张俭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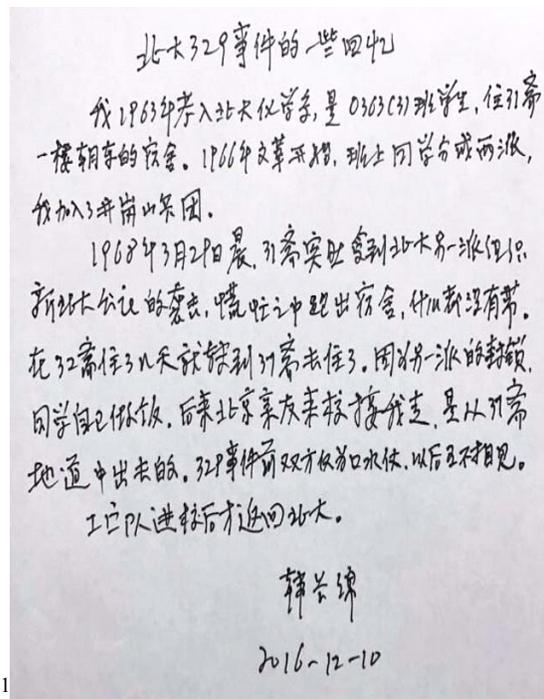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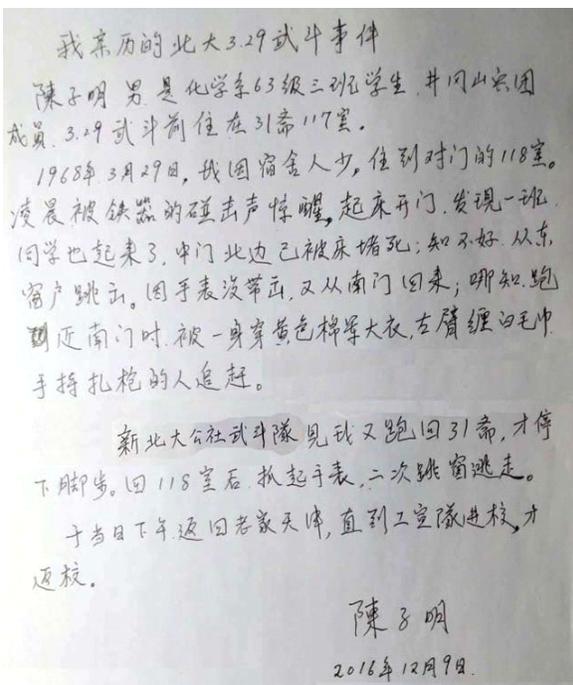
我们化学系女同学一直住在36斋，68年3月29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道的吵闹声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穿好衣服奔向楼外，就听有人说31斋打起来了。赶到31斋楼外，见到班上的井冈山男同学，个个惊魂未定。问他们，都回答不知道怎么就被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赶出来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夜袭占楼暴力行动。

自那天起，井冈山的男同学“无家可归”了，直至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割据”局面形成后，井冈山兵团的学生被包围在六栋楼内。我因真正的无家可归，与同命运的同班同学王文芝住进37斋四楼，对门邻居则是生物系毕业班的刘玮同学，虽不相识，见面时他总是友好的打招呼。万万没想到的是，善良、文气的刘玮竟惨死在新北大公社惨无人道的暴徒手下。被困在楼里，男同学外出太危险，于是我和王文芝担负起去海淀街上购买食物的任务，但是也不敢频繁外出，只能选择合适的时间，小心谨慎出行。在329那天，建明冒着危险抢救出自己的自行车，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又一次进攻中被抢走。直到“大联合”，建明在34斋一楼楼道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车子的后“挡泥板”还被油漆涂改了颜色。

1968年3月28日晚间，在临湖轩召开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各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在这个武斗决策会上，聂元梓拍板——“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1968年3月29日凌晨1时，校文革武斗总指挥高云鹏指挥，校文革属下的新北大公社红九团长矛队，有组织、有预谋地突袭31斋化学系学生宿舍，切断电源，在暗夜中，把赤手空拳的“井冈山兵团”学生从睡梦中惊起，驱赶出楼，引发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在北大，称为329事件。

往下，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武力围困着反抗他们的“井冈山兵团”学生据守的6座学生宿舍楼，长达4个月，企图把“井冈山兵团”彻底打垮、剿灭。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指派8341部队和3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京各高校。■



¹ 司徒文：《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2009年第7期。

北大329事件的亲历

樊能延，男，北大化学系03633班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北大文革武斗前，住31斋119室。

1968年3月29日凌晨，我们宿舍楼遭到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突袭，我们赤手空拳。我从一楼盥洗室跳窗逃出楼。

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割据局面，我住37斋学生宿舍楼，直到工宣队进校。

樊能延

2016年12月9日于北京

我亲历的北大3.29事件
姚建明，男，北京大学63级化学系学生，文革期间，井冈山兵团成员。3.29事件前住北京大学东斋121室。
1968年3月29日凌晨，从睡梦中突然听到楼道北端口传来金属打击声。室外雨，楼下一片漆黑，他随即跑进宿舍。宿舍的人正在打斗。我手足失措，仓皇而逃。
从此所有3.29事件的全部损失。不久便南下以海躲避武斗，直至武斗结束回校。
姚建明
2016年12月9日

1968年3月28日夜，我在睡梦中被楼道里铁棍砸门的声音惊醒，有人大叫“公社的长矛队来了，快逃！”当时我住31斋一寝朝西的宿舍，匆忙披上衣服从窗户跳了出去。逃出来才发现31斋各门已被新北大公社的长矛队把住，正在往里冲的人，被赶出来的同学都很气愤，当时大家还没意识到这一刻就是北大武斗的开始，即3.29事件。
北大 03633班 李乾宽
2016年12月9日于杭州
我记得我住走廊西侧的屋子，从窗户跳出去的。想起我姐夫送我的一件大衣，又从窗户爬进去取出大衣。—— 补记

我叫李乾宽，是北京大学03633班学生，住31斋117宿舍。

文化大革命之大串联开始后，我基本上都在四川、贵州搞串联，很少参加北大的运动。但观点倾向反聂元梓的井冈山派。

1968年3月29日我不在北京，而是在贵阳。当我于四月中旬返回回校时，31斋已被新北大公社武装占领。我的宿舍也被他们占领了。经交涉回到我宿舍时，我的个人物品全部被洗劫一空：包括被褥、衣物、书籍及其他。

经交涉，公社的同学只给我弄了一套被褥，其他东西已无法寻找。我只好找到43斋一楼去居住：那里没被武装占领。直到工宣队进校。

李乾宽

2016. 12. 10于贵阳

北大329事件的亲身经历
朱开宝，男，北大化学系03633班的学生，文革时期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68年3月武斗前一直住北大学生宿舍31斋一楼。
68年3月29日凌晨，我们住的31斋楼遭到新北大公社武斗长矛队突袭，我们在睡梦中被长矛队敲击声惊醒，毫无防备。我和同宿舍的井冈山兵团的同学一起从窗户外逃出。
从此北大形成武力割据的局面，我无奈再回31斋宿舍，后来住37斋学生宿舍楼，直到工宣队进校。
朱开宝
2016年12月9日于休宁

【述 往】

难忘的燕园·1969年（三）

——回到38楼的半年

吴琼

第五章 回到38楼的半年

燕园里，南阁是个美丽而迷人的地方。这里静谧而略显神秘，似乎躲藏有不少生命力充沛、欢乐的小精灵。在我和邓先生居住的那个房间的窗外，高大的松树和柏树身披斑驳白雪，一声不响地傲然挺立。各种各样的树木和灌木丛勾肩搭背，错落有序，悄然地把南阁和北阁环绕起来。小巧的灰喜鹊，黑白羽毛相间的大黑喜鹊和三五成群、机灵的小鸟们也害怕寒冷，无论白天还是晚间，它们都喜欢光顾这里，在一起团聚、玩耍、嬉闹或者睡一会儿觉。有时候，胆子大一些的麻雀或喜鹊，一两只或者两三只，看到我们在房间里谈话或走动，还会好奇地飞到窗户外面的小台子上驻足、行走、跳跃，甚至有时还会像演杂技那样，在窗棂子上勾足倒挂，窥视窗内的动静。我只要在房间里大声咳嗽一下，它们就会惊慌失措地展翅飞开，一会儿就飞回到积雪的树杈上，立图站稳脚跟，从脚底下抖落出一串串亮晶晶的雪花，一阵阵白烟似的雪雾。它们站在树杈上，还会掉转过头来，用大惑不解的目光默默地注视你……

一天清晨，我像往日一样，按照监管规定，手拿一把笤帚，低头清扫南阁一层的地面，老邓和红卫兵们还没有起床，忽然，看见我家的老六、上北京二中的大弟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冷不防到来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还立马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我挣开他说：“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这种地方可不能久留，有什么话，你快讲。”

弟弟讲：就在我逃离北大的那一天，军工宣队不但兴师动众地搜查了我家，而且，还

搜查了我的女友马明明的家和男友梁宝璟的家。他们像清乡、围剿那样，团团封锁住附近的街道和几条胡同，甚至攀登上平房住户的房顶，一时搞得惊天动地，搅得左邻右舍住户们惶恐不安，一连几天都在议论纷纷，不断来到我家，打听我的生死消息。

弟弟还讲：因为母亲不知道我在北大出了什么事情，是死是活，所以心急如焚。她在被搜查的第二天，就焦急地乘公交车赶到燕园，好不容易才找到军工宣队办公室，开始询问情况，谁知军工宣队的接待人员，却给了她这样一番答复：“吴克思的母亲来啦？噢，您就是吴克思的妈妈吗？幸会幸会。您放心吧，吴克思没有死，他还活着。但是按照我们的规定，今天不能让您和他见面。还有，您一定要做好精神准备——准备过些日子到监狱去和他见面吧……”母亲听到这样的答复，立刻号啕大哭，是痛哭流涕离开燕园的。

最后，弟弟还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讲：我的未婚妻马明明原来一直在做我赴宁夏隆德工作的准备，还奇怪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拿到毕业分配的派遣证。北大军工宣队搜查了她家之后，她才知道我在燕园里出了大事……她怀疑我已经自杀，不在人世，从此日夜伤心哭泣，心脏病发作……她现已住进阜外医院重症病房，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病情相当凶险，医生已经下了两次病危通知单。

自从弟弟来南阁探望之后，我总是挂念明明的病情，从此心烦意乱，神不守舍，坐立不安……

1969年3月，果然，原来的军工宣队撤离北大，以8341部队为首的、新的军工宣队开进了燕园。此后没过多少天，郭罗基、邓艾民就被释放，可以回家了，可是，我却依然处于被监管状态，不能毕业分配，也不准回家。新的专案组安排我回到了38楼食宿，一晃儿就是半年。

回到38楼后我才了解到，在我被关押在东语楼和南阁的那几个月，哲学系师生员工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都被集中到了38楼集体食宿，按年级和班次划分为连、排、班，过起军事化的生活，每天军训、跑操、立正、稍息，在各个寝室中读毛著，学习文件，讨论大好形势，“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活动。除了患重病不能动的人，无论男女老

少，身体状况如何，家中有无困难，一律如此。而以 8341 部队为首的、新的军工宣队来到以后，虽然给师生员工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身体上松了绑，不再要求大家一律食宿在 38 楼，但是，在精神上并没有给大家松绑。新来的军工宣队按照“斗批改”运动的需要，把全系人员重新排列重合，新老搭配，组编成许多军事化的学习、战斗小组，小组里主要的战斗力构成是 69 届、70 届的学生，然后“掺沙子”，加入几个领导干部和教员，以及有问题的教员学生。每个小组，当然要由一两个军人或工人牵头、领导。师生员工们就这样被组织起来，彼此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形成一股股新的战斗力，开展一场又一场深挖并斗争暗藏的阶级敌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旧思想，改革旧教育体制和创建新教育体制的“斗批改”运动。

我所在的那个小组在 38 楼一层一个寝室里活动。小组主要由 70 届的十几个学生组成，由新华印刷厂的两个工人为领导，小组成员中还有中哲史教授张岱年先生、副教授朱伯昆先生，西哲史讲师朱德生先生和李真先生。人人都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向大家披露个人隐私，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经历，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还要经常“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此外，当时最有时代气息的小组活动，就是人人必须参加、绝对不可以拒绝的“早请示”、“晚汇报”和“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毛主席语录》须臾不可离身，毛主席像章绝不可以忘记挂在胸前，否则，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众目睽睽之下的异类，一定会受到军工宣队的怀疑和质问。尽管早在 1965 年“文革”发生前，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便承认中国存在对他“个人崇拜”的现象，后来，他也说过对这类现象“讨嫌”，但是，当时林彪和江青却把“个人崇拜”煽动得达到无以复加、狂热、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各地大跳“忠字舞”，燕园内也如此。在 38 楼下面，在一棵大树底下，以一块大石头为中心，就有不少哲学系和外系的人跟风，围起一个大圈子跳起来，舞起来。那些虔诚、可笑又离奇古怪的舞蹈动作简直不堪入目！我每每在小组寝室里学习、讨论时，听到外面传来的这种宗教般的歌舞声和跺脚声，就感到恐怖，常常紧张地抬起头，打量一番在场的小组成员，同时，

头脑中不由得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是发誓要一生追求真理的、我的同学们，还是熟谙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王充、范缜，熟谙西方启蒙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哈、爱尔维修那些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我的老师们，为什么会容忍这种新的宗教迷信呢？——是的，我想，他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确实有难言的苦衷。从人类历史上看，凡是错误的政治，必然需要有精神方面的错误形式来加以配合，如果要反对这些错误的精神形式，一定会受到政治的高压、严惩。当时，在我们这个小组里只要有一个人敢于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这样做不对！这是丧失理智！这是搞宗教迷信，是愚昧，是反动”，那么，完全可以预料到，这个大智大勇之人，立刻就会被颠倒是非地打成“反革命”，甚至会被“专政”、枪毙，而且，连尸体也不会保留。

在我回到38楼那半年里，新来的军工宣队所领导的“斗批改”运动，仍旧是原来的军工宣队领导“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只不过与原来的军工宣队相比，这次军工宣队在“清队”工作中更讲究谋略和策略，显得更有步骤，更有章法。在这次新的“清队”运动中，第一阶段，军工宣队先把清华大学一些已被清理的“阶级敌人”，“叛徒”、“特务”、“走资派”大汽车拉到燕园，在东操场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其中，就有“中国有三钱，不怕没有原子弹”“三钱”一钱伟长教授。在大会主席台上，在迟群和谢静宜的亲自监督之下，钱教授在发言中一直不敢抬头，战战兢兢地交代自己是怎样在政策的感召之下，向军工宣队坦白交代自己严重的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第二阶段，就该轮到深挖燕园里躲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在东操场又开了一次全校大会，开得真可谓轰轰烈烈，令人目瞪口呆。在这次大会上，竟然揪出了一个“中统特务”而且，这个“特务”在哲学系，是个副教授。在场的哲学系师生当时纷纷站起身来，伸长了脖子往台上看，大吃一惊！原来，哲学系的这位副教授，居然是和我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共同战斗多日的中哲史教员朱伯昆先生——可是，令人大可回味的是，过了一些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些在当时“清队”动中被打成“阶级敌人”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各种政治帽子的人，绝大多数又被平反昭雪。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确实发人深思，值得各

方面认认真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当然，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和政治高压下，包括燕园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三缄其口，或者，言不由衷地采取应付态度，因此，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了一些人处理问题的主要依据；当然，也有极少数个人利益熏心的小人，利用这种非常时机，投机取巧，堕落成为两面派、阴谋家和野心家，为人们所不齿。

回到了38楼那半年，我就是在这种时代气氛中，而且是在“群众监督”之下，参与燕园里各项政治活动的，可以说没有丝毫快乐可言，也正像屈原在《离骚》里所说的那样：“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我异常痛苦地度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大约是在我回到38楼之后两个月的一天，军工宣队专案组终于允许我走出燕园，去市区看望亲友了；但是，每个月只能回去一天，次日一早必须返校。就在那一天，我回家看望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到了晚上，又到阜外医院，看望了病危中的未婚妻马明明。■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五）

——大串联

陆伟国

四、大串联

（一）倾巢出动

从6月初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开始，就有一些周边地区的学生跑来北京看究竟。据丁晓禾的《狂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说，“早在1966年6月10日杭州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啊！”最早成批的、数量较多的学生进京，是8月13日天津有四千多学

生为寻求“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北京红卫兵的声援，要“告万晓塘的状”，徒步前往北京。毛泽东得知后当即作出指示，由中央“文革”派车在杨村接了他们。

北京学生的大批外出是在8月下旬。8月24日的晚上，传来消息说，“中央文革”赞同北京的学生出去闹革命，把革命的火种洒向全国各地。北京的学生就此蜂拥而出。我们当然也闻风而动，说走就走。两三天后，8月27日，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集体行动，取了个名字叫“红旗战斗队”，抬起腿就出发了。

正式通知是9月5日下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大串联的通知，名字挺长，也写一下吧，叫《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说的是，坐车可以不买票，有的地方连吃饭都不要钱，试图以此把红卫兵的洪流冲向各地，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这下，红卫兵们可高兴了。不光是北京，几乎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像炸开锅一样地沸腾了，就像成千上万的麻雀，轰的一声，腾空而起，树林子里反而没鸟了。

我们去的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离京的列车上，挤满了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红卫兵，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神气活现。也有一些被赶出北京的“牛鬼蛇神”，躲在角落里，看见红卫兵就惊恐万状。有对中老年妇女，不知是母女还是婆媳，像是被赶出北京回原籍。老太已经被打断了双腿，用竹板和纱布捆着整个下肢，就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地板上，看着我们穿着黄布旧军装的红卫兵走来走去，满眼惊恐，不断地用手撑地，想挪来挪去躲闪。中年妇女则在五、六步之远，满眼伤戚，不敢过来。我能做的，就是板着脸在那个老太边上站着，好像是在看守，别人往来至少可以不去故意地踩她踢她。

串联的第一站是上海。出了上海北站，我们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豪情万丈。可能毕竟大多是农村的孩子，一踏上大上海的马路，竟然底气不足，心里有点虚。按红卫兵的惯例，边走要边唱“造反歌”：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嗨！
忠于革命忠于党，
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嗨！”

此歌也叫“红卫兵战歌”，据说作者是北大附中的吴少华。

结果张嘴一唱，居然会变了调，两次都没唱起来。干脆不唱了，还是去找去接待站的车站。往外走的时候，一开始领队的还走反了方向。应该往武进路走的，却往天目路去了。

安排我们住宿的地点是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23年后，1989年春，我参加出国外语考试，再次住在这里。考的是俄语，原准备去格鲁吉亚。但随后的政治动乱，使此行成了泡影）。住下的第二天，回家去看看。这是1963年暑假后的第一次回家。但是，当家里看见我穿着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装：黄军装，红袖章，腰束铜头皮带，竟也有一阵不安。虽然我家里是工人家庭，属于红五类，没有受到冲击，但邻居们有吃到苦头的，对红卫兵视若瘟神。家里人叫我回家时可别穿这种衣服，要遭人恨的。耀武扬威的红卫兵，在人们心中，原来是这种形象。其实那时上海红卫兵还远不及北京的厉害。后来，去见高中老同学，当然也不会穿这个行头了。

晚上我们去南京路宣讲“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论调。这回儿好了，适应过来了，很随便地带上两个板凳，事先也不用准备，站上去就讲。上海市民非常关注，有不少人马上就围了上来，里三层，外三层的。不但认真听讲，还提出了不少疑问，一个问题接着

一个问题。我们其他同学就在四周，也被很多市民围着。我们还真是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讨论、答疑。

这时的上海也已经开始破四旧、斗黑帮，当然声势、手段远不及北京的凶狠。市民们最关心的是：“文革”是这么搞的吗？这是党中央的意思吗？他们焦急地一遍遍地问，也坦率地提出了他们的不同意见。有的人情绪还挺激动，话也很尖刻，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真有不肯罢休的意思。我们也照着“5·16通知”（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通知）和“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进行宣讲，这确实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思。既讲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理论：造反有理、破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要支持红卫兵小将这些；也讲运动过程中要讲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而不是触及皮肉。说起这些来，我们也是不厌其烦、一套一套，好像对文化大革命热忱得很、理解得很。我们自己也说，在学校里是“保皇派”（保郭影秋），出来都成了“造反派”。

当时街头大辩论，还有个常见的话题，就是对“血统论”的争辩。那时有个被红卫兵大肆渲染的对联，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它是在7月25日由北航附中红卫兵贴出来的（另一说法，是北京四中刘辉宜写的），又经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一篇文章《从对联谈起》的渲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毕业后参军，改名谭斌，后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这个对联集中反映了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政治优越感。他们的父母从庄稼地里出来闹革命，经过了千百万人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好像就成了天下是他们爹妈打下来的，就应该由他们来坐天下。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变成他们父子世袭、封建传承的家天下。尤其是，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是红五类，那就是猪狗不如，就是无情打击的对象。有一副改编过的对联更能说明问题：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才一代人的时间，封建思想就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头去了，充分显露了中国革命队伍里所带有的明显的农民意识。

这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感。市民们常常拿出这个对联进行批判，作为对红卫兵的批判。我们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红五类，对成份高的压力感受不深，明知不对，嘴上却不能不硬撑，就说这幅对联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体现了阶级立场，当然如果改一下能更好些，比如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横批：理应如此。其实这副改动的对联，还是陈伯达写的。

起来反对血统论的，当时有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北京的一个青年工人遇罗克。他父亲是资本家、母亲是右派，自己学习成绩很好却深受血统论之害，上不了大学。他写了篇“出身论”批驳血统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结果，在196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两次被下了处决令。“一打三反”高潮中，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与另外18人一起被枪决。这批人中有一半是所谓的“思想犯”。

遇罗克的死，也有多种说法。金春明等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一书中说：“1967年4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作者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逮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

后来，把《出身论》发表出来并为此创刊《中学文革报》的牟志京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要杀遇罗克的，远不是戚本禹那样的人物。他在文章中说：“有内部消息讲，遇罗克的死刑是经高层人物亲自指示，重要人士受托办理的。”（请见：《〈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牟志京。该文刊于徐晓、丁东、徐友渔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这个高层人物是谁，至今还不大好说。因为如果是林彪、四人帮，那就完全可以直说了。）

遇罗克后来于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应当说，我们那时在街上的这些鼓噪，也是在为极左势力帮腔，为极左势力的洪水添加了一瓢水。如果说还有可原谅之处的话，那就是为这些还在疑惑中、还没有对这场规模空前、手段非常的大革命反应过来的市民们发出了信息、发出了警报，让他们对即

将到来的大风暴有所醒悟、有所准备。我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人民大学红卫兵的旗号(与称之为“人大红卫兵”的,不是一回事,那个是作为一派组织的专有名称),那行为、那仪态、那语言和水平,和那些张嘴就骂、动手就打的红卫兵完全不一样。那些市民们尽管仍然是疑虑重重,可愿意和我们交谈、甚至争论。

有位衣着得体、干部模样的妇女,疑虑而又急切,过来很认真地问我:“你们有学生证吗?”要是那种红卫兵一定会跳将起来,大叫:“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你敢不信?”皮带啪啪地就抽下来了。但我很坦然地拿出来给她看。她看了学生证,抬头看了我,说:“你还是上海人啊?”我点了点头。她很沉重地递还了证件,低着头,转过身,走了。我想,她也是遇到了很大的疑惑,甚至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这一瞬间,她知道了,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是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

后几天也去了复旦、同济、交大这些高校看大字报。

8月30日下午,我们还参加了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都出面了。结果北京红卫兵把它开成了批判上海市委的大会。主要是红卫兵上台批判发言,市委领导他们在一边站着听,接受批判。那次没有动武,没有搞“喷气式”、挂黑牌这些,只是动动嘴。按那时的说法,革命形势还很“落后”。

当时各地的领导对北京来的红卫兵,是有一定防范的。据《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说,投入造反阵营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后来揭发市委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对抗‘文革’”、“破坏大串联”时说,市委组织了一些学生、员工去和街头宣传的南下红卫兵进行辩论,“要注意一些表现恶劣的,要告诉他们的学校。”(他们哪知北京的校领导此时都自身难保,哪赶上他们的处境)我们在街上遇到围着我们死死辩论的,问我要学生证看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了。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基本上是三波。第一波是8月底,分散的一些,主要参与了“文革”的舆论造势。第二波开始是有组织的了,在9、10月份,主要参与了“破四旧”、“斗黑帮”等。第三波是11月以后,直接参与了造反夺权。我们算是最早的第一波。8

月30日的大会，是红卫兵炮打上海市委的头一着。会后，以北航、清华的红卫兵带头，突破工人的护卫，冲击了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机关。不过，我们没参加那些，很快就去了杭州。

在杭州，不知不觉地就有点松懈了，主要也就是游览玩玩。浙江省委领导听说是一帮北京来的红卫兵，也都有求必应，安排了接见。接见是在一个大会议室，浙江省委的一位书记特地强调：“我们浙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省，铁路、民航都归上海管。虽然是沿海省份，却没有海港，也就宁波的甬江有点小码头，还赶不上上海的苏州河。”意思是这儿水很浅，你们快走吧。讲得倒是挺策略，我们几位同学还真的直点头。

在杭州的几天，除了这次接见，也就是去浙大看大字报和座谈与“革命”有关了。

但是，游览也已经没有更多的可去之处。灵隐寺这些地方，都已经及时关闭，保护起来了。

最后去了南京，住在南师附中。冥冥之中，或许真有条线牵着。15年后，我举家到了南京，就住在离这儿不远、步行约一站路的地方。又五年后，我的女儿上了这个学校。

这才没过几天，形势又大不一样，对学校 and 行政领导的冲击更加显而易见。当时大约学生们都外出串联了，学校里空荡得很，没人理我们，更没有人出来接见或接待我们了。不过从墙上残留的大字报看，对老师的批斗殴打也挺厉害，还写有逼迫老师跪在操场的砂石跑道上爬的情节。我们又到雨花台瞻仰了烈士陵园。长眠于地下的他们看到这种乱象，不知会作何感想，不知他们能不能躺得住。眼前这景象，难道就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拼活换来的理想社会吗？

在南京，大概是革命浪潮的冲击更加汹涌了，我们已经见不到领导干部，只有自己到处走走。而我们的的心思也有点散了，都不想去什么地方了，连市中心新街口也没去。除了雨花台，就去了南京大学看大字报。在南大，我们又见到了已经毕业分在南大的人大研究生、我的崇明老乡沈士诚。我还去找过我的一位在地球化学专业的高中同班的孙

同学，可惜他已回上海，只在他宿舍里，看见空荡荡的床铺。没几天就匆匆地回到北京。

这三个城市，前后也就是十几二十天，我们的态度和当地领导的态度，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更谨慎、更无能为力了，而我们则有些懒散了。

大串联，这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人口大流动，对于左倾势力来说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彻底打乱走资派的阵脚，彻底打乱行政官僚的运转体系，使它在全国各地上下各级迅速地完全地瘫痪。大串联确实很快地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传统的管理层（执行层，即各级原有的领导干部），在大串联的初期也明白这是意味着什么，也曾有过抵制，也曾试图限制。但很快就无法抵挡这汹涌而来的浪潮，连自己也被纷纷吞没。

对于那些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大串联完全是自己组织、自己打算安排，走到社会上，行进在风雨中，开阔了视野，受到了一些锻炼，更深地介入了文化大革命。一些人就此对文革了解得更多了，理解得更深了，头脑更清晰了。也有些人却更发热了，陷得更深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自觉不自觉地冲在前面，甘当马前卒，甚至成为极左势力的帮凶和打手。

等到1967年初，大串联在高层再三的呼喊要求之下基本停息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设想的“以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只实现了一半。“大乱”，倒是乱得不可开交。不过离“大治”却是越来越远了。■

【述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九）

——“五七干校”（下）

宋翔雁

第一节 儿病危，母返京

正当我对电锯组的工作应对已经比较自如的时候，突然于70年3月28日下午3时接到北京的来电（儿子突然患病这段时间——70年3月28日——70年5月5日，我又恢复了记日记的旧习，故得以保留了准确回忆的依据）称：“小牛病，速回京”（小牛为儿子乳名）。接电后我们一下就蒙了，不知孩子何病，为何如此突然？但我们还是立即拿着电报前往校部请假。当时校部办公室的负责人看过电报和我们的请假要求后说道：你们先回去，我们要请示一下军宣队领导，再给你们答复。当时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一切都要经过军宣队的认可方能执行，因此我们再急也没用，只好回去先自行准备，并等待批复。

可能因为心急如焚，总觉得时间好像停滞了一般，慢得出奇。一直等到晚饭前，才得到通知说（校部派人到宿舍传达的）：军宣队领导说要经过留守处核实后，方能批复。眼下你们需要安心等待，继续完成各自的任务。听到如此冷冰冰而且对下属毫无信任可言的回话，真让我气愤至极，但我知道这与传话人无关，完全是军宣队这帮以改造人自居者的作为。故我还是平静地问道：为何请假还要核实，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孩子才一岁多点，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对我的问话来人的回答是：现在很多人都来电报要求请假回京处理，其中真假难辨，所以军宣队决定一律要经过留守处核实后，方能批复。这点也希望你们理解。我又追问道：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孩子若真的出了事谁负责？对于万一孩子出事谁负责的问题他始终回避不答，但却明确告诉我们，办公室是通过长途与留守处联系的，他们一经核实，也会通过长途告诉我们的，我们会抓紧处理，这点你们可以放心。但什么时间能得到回音，他也说不好。因为我们的对话就在集体宿舍门口说的，声音也比较大，所以室内很多人都能听到（因南方的房子隔音很差），为避免不必要的影响，我们也就不想再与他争辩，只好提请他注意，如果等的时间长了，请他们能主动再与北京联系，对此请求他同意后，我们就决定自己先去仁和公社，分别给我姐姐及帮带孩子的朱师傅打电报和电话，以便问明情况。给我姐的电报顺利发出了，告知儿子病了，请她速往查看，并回电告知。

但给朱师傅打电话尽管等了快一夜，也未能接通。至凌晨只好悻悻而归。

29日上午稍事休息会儿，昭明又去仁和想给朱师傅再打长途询问情况，并商量好万一打不通，就发电报，让朱师傅详述孩子病情，不要怕花电报费，以便我们能知详情。我也回到电锯组上班，由于一夜几乎没睡，加上心里对孩子病况的担忧，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起来，这就犯了电锯操作时的大忌。临近中午快下班时，终于事故发生了。当时我自己操作小电锯开小板条，就是因注意力不集中，右手拇指在送进木料时未能及时脱离（也未按往常要求的，临近送料末端，最好用另一小段木料推送，而不要用手心的告诫），导致被锯片切进12毫米的一个深口子。幸运的是锯片是顺指向切入的，并未伤及指骨，但疼痛至极，且出血很多。

我立即关了电锯，拉了电闸，打过招呼后，左手使劲掐住右拇指奔往校医室。恰好校医室是外科大夫陈碧燕值班（她是我中学好友的表姐，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熟识），她首先止血、消毒，并仔细检查确定未伤及骨骼后，给我做了紧包扎固定。她说：因伤口两侧均有指甲，这里的条件不便缝合，只要注意不着水、不感染，伤口可以很快愈合。在她为我包扎时，因疼痛过剧我还晕厥过去。当包扎好后，她让我在校医室躺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还给我服了止痛药、喝了些糖水（是她自己的糖），并告诫我不要为孩子的事太过着急，搞得自己心神不定，倒反误事，眼前的工伤就是警钟和教训。

事后每当想起，我都真挚地感谢她在那样的环境下，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忠告。她在75年北地迁往武汉时，随其爱人一起从北京调往河南郑州，此后我们再未能谋面，只能借此文祝愿她一切安好了。她若安在，如今已是米寿之年了！

昭明到下午才返回干校，告知电话仍接不通，只好发了个电报。看到我手指又受了伤，心情更加不好了。我只能尽力地安慰她，并告知陈大夫说了手指伤只要不感染就没有什么问题，不用担心。我们都明白，在这种分外焦急的情况下，需要的就是相互间的劝慰，这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方法。

到晚上，我们接到了孩子姥姥3月24日写自北京的信件。信中还说到孩子很好，并告

知孩子三姑已回京，但还将去山西劳动。从中我们可判断出，孩子的病是在24号之后犯的，而且，也知道我姐姐这时大约仍会在北京，若此，北京还有人能为我们暂时分担一些难解的问题了。这样一来，我们两人的心境苦闷程度也就多少得到些缓解。29日就是在这种担忧煎熬中度过的，直30日早饭后北京方面仍无回电。约到10时，校部通知准昭明回京探亲。这样我们如释重负，昭明立即去仁和乘船赴清江，准备从京广线乘火车回京。

中午12时左右，通知我有电报，我即刻赶去仁和查询。知是我姐姐的来电，告知儿子肺炎住院，现高烧已退，继续观察。回干校不久，4点左右，接昭明从清江打回的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我告知三姑来的电报内容，让她在清江继续与朱师傅联系，进一步问一下情况，再定有无必要回京探视。31日正午前，昭明从清江经仁和又返回干校。她告知我在清江与朱师傅联系上了，知道儿子因肺炎住院，现高烧已退。据此，她觉得与姑姑的电报所述一致，加上姑姑现在在北京，孩子身边有亲人也可放心，就决定暂先不回京，并委托他好好照顾，等确实好了以后再出院。对于昭明的决定，我完全同意，这也充分表明了我們绝非畏惧干校环境艰苦的好逸恶劳之辈。

但我们还是上当受骗了，轻信了朱师傅隐瞒孩子生病真实原因的谎言（当然，这也与姑姑电报中怕我们着急未将全部真情告知有关），导致昭明做出暂不回京并即刻返回干校的决定。就在昭明回到干校仅两三个小时后，午饭时，校部又转来探工系留守处发来的电报，言：宋淳患肺炎，脸部灼伤感染，现住院。见此电报，我们大吃一惊，孩子灼伤感染一事，朱师傅为何在电话中只字未提呢？为何又会感染呢？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决定昭明还是应当迅速回京，一方面可以照顾孩子，更重要的是应当搞清楚情况，以便决定今后如何安排！就这样昭明又立即办了请假手续（准假20天），决定四月一日再次赴清江转车赶去北京。

我一早送昭明到仁和，直到船离岸驶往清江，渐渐看不清她的身影后，我才慢慢转身踏上返回龙陂的归途。但我的心似乎也被昭明一起带回北京，走上看望儿子的旅程。内心的焦虑、思念，加上这几天的折腾，两腿似如绑了沉重的沙袋，抬不起腿、迈不开脚，晃晃悠悠地直到午后3时许才回到干校。回到宿舍，看到同事们给我打好的饭菜，我很感激。

但我毫无食欲，喝了几口水，爬上床铺躺下来想睡又睡不着，只是闭着眼睛，想着儿子的病情和伤势，惦记着妻子的劳顿和身体。我的心境越来越低沉。再过几天我就33周岁了，从来没有过的悲苦折磨着我，令我喘不过气来。一直以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坚定、向上的人，而今为何竟会如此儿女情长呢？我一时找不出答案，但我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被这种悲苦的情绪所左右，如此只有百害而无一益。于是我坐起来，并从床上爬下来，强迫自己吃了点东西，然后到电锯组看看（因我手指有伤，还不能干活）。看到大伙儿都在忙着，我也无法插手，只能与大伙儿打个招呼，然后收拾一下工棚内外的环境，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下班时，我才把孩子情况和干校已准假，昭明上午即赴清江转车赶往北京的事和大伙儿说了说。大家均劝我不要着急，身体不好不用急着来上班，而且告诉我，今天王师父已经来把大锯盘整出来了（自我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大锯盘整平后，王、李二师傅基本很少到电锯组来，电锯组的工作，主要由阮天健老师管理安排。他们则把主要精力完全放在木工队建房那边了），这两天都有得用。并说，王师父讲了，这几天他都会抽空过来整修大锯盘的，你的手必须完全好了以后再接过去。我谢过大伙的好意，面对大家的关心和周到地考虑，犹如一股温馨的暖流，驱散了几天来一直压在自己心头上的悲苦愁情，似乎我又活过来了一般！

4月9日，我接到了昭明回京后的第一封来信，告知我孩子此次患病的真实原因。对此一方面真让我吃惊，看似一对相当老实的工人夫妻，竟如此不敢担当，用谎言欺骗，险些葬送了我儿子的幼小生命；另一方面又非常庆幸孩子的姑姑恰好回京，没有听信张阿姨（朱师傅的爱人）的谎言，坚持去医院检查，从而赢得了抢救的时间。

昭明信中写道：儿子是22日烫伤的，但朱师傅他们隐瞒了此事，没有告诉姥姥和姑姑。姑姑24日回京后，就立即去地院看望孩子和他姥姥。发现孩子脸上包着纱布，问时，阿姨说是孩子学走路时不小心摔了，脸部有点擦伤，已经在校医室上过药了。因孩子学步时摔跤很自然，加之当时孩子并无异常，故姑姑并未指责，但提醒阿姨要注意防止感染，然后就离开回师大去了。26日，姑姑不放心再次去看孩子，这时孩子有些低烧，姑姑建议去医

院检查。但阿姨说到校医室看过，而且已经打了青霉素了。姑姑见孩子精神还可以，也未坚持一定要去医院就回去了。到27日，姑姑仍不放心再去看时，孩子已发高热，姑姑让去医院检查，阿姨仍不同意。这时姑姑发了狠话：他父母不在，孩子有病去不去医院必须听我的，我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阿姨只能按姑姑的要求，随姑姑一起带孩子去了三院。即使这样，她在医院还继续欺骗大夫，隐瞒烫伤实情，说脸部只是摔伤，不让大夫打开包着的纱布查看。最后因找不到高烧和白血球奇高的原因，大夫怀疑是因伤口感染引起，而强行将包裹的纱布打开，才发现烫伤处已开始化脓，呈现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而青霉素对此不起作用，故孩子的病情得不到控制，有转成败血症和肺炎的危险。但三院无特效药不好收治，建议迅速前往儿童医院抢救。正是由于姑姑的坚持和三院确诊的正确和转院及时，才使孩子的小命得以挽回！

从信中我也得知，孩子的肺炎已经好了，原本已想出院。但因又开始发烧，故还需再留院观察，让我放心。有昭明在京，加之病情已得到控制，故我的心情就稳定多了。而且手指的伤口已完全长好，虽用力时有些异样的感觉，但基本不妨碍锯盘的整修了，所以我又将这项工作从王师父手中接了过来。似乎一切又回归常态，但孩子原本已打算出院了，为何后来又发起烧来呢？这个问题总缠着我，让我不能完全踏实下来，直至4月12日再次接到昭明来信方知，因孩子大病后体质下降，开始受到麻疹病毒的侵袭，故又开始发烧。直至4月5日全身出满疹子，高烧达39.9℃，被确诊为麻疹后，孩子才慢慢退烧，总算又过了一关。

因为孩子又出麻疹，出院时间后延，故我于4月15日再次给五连打报告，申请续假两周，以便能有利于孩子的身体恢复。但16日连里答复说，续假期限只批给一周，对此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赶紧去仁和将情况电告昭明，好让她尽快考虑好孩子下一步如何安置的问题。18日接到昭明来信，知孩子已于12日出院，但身体很弱，至今还站立不稳（病前已开始学走路了），要想恢复到生病之前的体质，看来还需不少时日。这也是我们不敢贸然

将孩子带来干校的重要原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间的两地传书，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孩子的安置问题。

鉴于孩子当时的体质很弱的现实情况，立刻带来江西恐难适应，万一患病更不好处置。若另找新人托带，情况不熟悉风险会更大。继续让朱师傅家人照应，虽有这次事件的阴影看出他们的自私和狭隘，但这次的大风险，对他们也是一次大的教育，说不定坏事能变成好事，今后会更尽心一些。再不济，也不至于隐瞒实情，捅出这么大的漏子！思前想后，我们终于在4月22日作出决定，将孩子继续留在朱师傅家照看，照看待遇不变，但必须对孩子尽职尽责，今后决不允许再隐瞒实情，不管出什么情况，必须实话实说。有问题不好处理的，就打电报或挂长途，费用由我们负担。

这些意见，均由昭明向朱师傅和张阿姨两人一起交代讲清。我们估计他们不会拒绝，万一拒绝，则不勉强也算让我们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那时只好带孩子来干校了，届时我再以要带孩子来干校为由，申请续假了。事情一旦作出决定，我的心情也就完全踏实下来了。

5月2日接到昭明4月27日的信，知道已与朱师傅家谈妥，他们同意继续照看孩子，并承诺尽职尽责，实话实说，至此因孩子突然患病住院造成的沉重精神压力，终于得以缓解。昭明也于5月5日回到干校，继续开始接受毛泽东独创的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生涯，而我们在分离一个多月后，又得以过上分居式的团聚生活了。

第二节 水边偶遇何部长

当我在木工队电锯组劳动期间，一天上班后王师父让我随军宣队蒋喜亭指挥长去一趟水边地质部干校，了解一下他们那边机木工方面的情况，为今后可能的合作趟条路。至于蒋为何去水边，王师父没说我也没问。上车后发现除蒋和司机外，还有物探的柴文全同志（当时他在干校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只知道文革前他是辅导员，文革中好像也是“红干联”的头头，但我们之间从未打过交道）同行。因为蒋原来是探工系军宣队的成员，我们

彼此都知道对方，故相互间不怎么说话。而柴与蒋之间沿路几乎说话从未间断，因我觉得和我无关，所以也就不大注意他们之间的谈论。行车的路上，蒋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在木工队的情况，我简单地向他汇报道：设备维护和刀具修磨已基本掌握，现已经能够独立应对了。但电锯盘的整平还不太行，一般我调好后，还需经王师父检查和找补一下才好用。接着他又问起此次去水边的具体任务，我简单告知是让我看看他们那边机械设备的情况，怕万一需要时，可知他们那边能否给以帮助。蒋听后说道：到水边后，你就直接去木工队办你的事，我们在校部有事与他们商量，大约要一个多小时，你要提前赶回校部来与我们会齐。

到水边下车后，我打听了电锯车间的具体位置，就按指点直接朝电锯车间的方向走去。当快到锅炉房时（因电锯车间就在锅炉房西边不远处，人家告诉我到那儿就能听到电锯的声响了），我看到对面有一位老者右手杵着一根木棍，左手拎着一个花楼铁皮暖壶，有点瘸行似地向我走来。当我们相距只有三四米时，我发现来者竟是何长工部长。这时我极其自然地迎了上去，很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个躬，并脱口而出地喊了声：“何部长您好”。根本也没有注意周边有没有人听到或看到，也没有想到若被别人听到、看到后，会有什么后果。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在地质系统多年来（从进入地质学院起，已快整十六年了）深深留在脑海中的印迹的自然流露。而奇怪的是，我在反干扰时期的疑惑、震撼和愤恨却荡然无存了（后来在我回干校的路上，我想当时那种感情的自然流露，也与文化大革命延续到现在，在自己脑海中，好的印象留存的已经不多了，相反，内心反倒存在很多疑问。而且，也与内心对如此动荡不定的生活状况和不知明天该干什么、前途何在等，越来越感厌倦和忧心的心绪也有很大的关系）。

老人对突然出现的这一情况肯定也感意外，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立即用拿木棍的右手食指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并轻声地说道：别这样叫，别人听到了对你不好。面对他的话语和说话的神情，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让我感到，在任何时刻总能把他人安危、好坏放在第一位的人，不可能是走资派，不可能是反党分子，他仍然应当是一位受

人尊敬的一个老革命、老领导。尽管他平时讲话过于随便，即使在公开场合的大会上，也会口无遮拦地说出诸如：你们都是我的兵——何家兵；地质队缺女的没关系，可以从苏联找，苏联人男少女多嘛；我不是中央委员，但毛主席说了，中央委员会不是湖南同乡会，你就委屈点算了等。但这些不着边际的戏言，对当时在大饭厅听讲的学生们来说，有几个会认真相信呢，大家只不过将其看作一种玩笑话，用以调节会场气氛而已，听后大伙儿会报之以一笑罢了。想靠这些去打倒一个人，岂不也是以言治罪乎！

当时对何部长的告诫我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您又没被正式免职罢官那该叫您什么呀？！何部长轻声地说：就叫老何多好！紧接着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告诉他我是地质学院的老师，现在仁和干校接受再教育。接着他又问我：你在文革中挨整了吗？我笑着如实地告诉他，开始挨您派的工作组整，现在又挨军宣队的整。听后他也禁不住笑着说道：革命嘛，难免不挨整呀。正确对待吧！说毕又问道：你是不是还有事呀？我说：对，我还得去电锯车间办事。他说：那就这样，并把木棍靠在腹部和我握握手。我又向他鞠了个躬，说道：再见何部长，祝您保重。他点了个头说声谢谢，就迈着瘸行的步子继续朝前走了。我看着他缓慢前行的背影，若非有事在身，我真会帮他老人家拎着暖壶，陪他走回宿舍，当时他的年纪应当已是古稀之年了。看他大约走出十来米后，我才继续向电锯车间大步急行地走去。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再见过何部长。

大约在74或75年夏，何部长还未能解放。一天他的一个侄子辈的亲戚何谓平同志找到我（他是探工系钻探实习室的实验员，我一进入大学时，他就在学校探工专业工作，那时探工还没有建系），问我能不能带他去我父亲的老友家去看望一下老人？他说，想问问老人家是否知道何部长大革命时期在湖南时的相关情况，因为组织上正在审查这段历史。我答应他这事我需要先去问问后再回答。我问后老人同意接待他，这样一天下午他开了一辆小吉普（当时他与郭兴老师和我系掘进教研室的汪铁铭老师等，都借调在体委登山处，正筹划着再登珠峰呢），由我带路去到老人家里。我向老人介绍后就退出来了，他们似乎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结束。

在回学校的路上，小何（他年岁比我大，但系里的老师们都称呼他小何，故我也就随大流如此称他）告诉我，他此行收获不理想。因他当时是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现需要证明的那个时段，他恰好不在湖南省。因此，想帮老人做点事的想法，也没能实现。最终何部长再也没有回到地质部，是何原因就不得其详了。但老人最终的结局还是挺好的，在部队系统结束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而且是高寿而终！

第三节 调回采石组

4月28日一早，我就随五连采石班上山打眼放炮开采建房所用的石头。因在学生年代，我曾是年级“出名”的锻工，曾带我的薛师傅说过：你可以说已经出师了。被评为当时年级第一名“出师”的技工！所以头儿就让我抡锤打眼，因一般生手是不让抡锤的，怕打不准伤了扶钎人的手（当时在干校为炸石头，都是人工打眼，钎杆需要另一人来扶正，以保证炮眼的方向）。出于安全考虑，当时连里选的是小号锤（重12磅），而且因怕伤人，抡锤的人也是打会儿歇会儿，我估计连续抡锤的时间也就10—15分钟，歇着的时间也差不多如此，所以体力消耗并不算太大，只是晴天时太阳照的邪乎，故采石组均是早出晚归，中午在林子里歇着，下午两点以后再干。

因为一出工就是一整天，所以刚到采石组时，我担心的是能否及时接到昭明准时回到仁和的时间，以便我去接她，减少一点她的负担。这下倒好，只能听天由命了。但她是怎么从仁和回到龙陂的，我不仅已毫无印象，而且也无法查询了。因这段时间最后一天的日记（70年5月5日）是昭明记的，她可能因为劳累，只写了“妈妈今日回来干校”几个字。为避免记日记出事，我此后又终止了写日记的习惯。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在干校的生活尚属稳定，除了“双抢”（收早稻、插晚稻）全校人员集中去大田劳动外，其余时间都在各自的班组里干活，我在采石组，昭明在菜班和编筐组劳动。个别时段，我又被机工车间借去帮助锻打割稻器的刀刃，当打造了几十对刀刃后，

我仍然回到采石组干活。在干活过程中，我并没有“接受五连监督”的特殊感觉或压力，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和大家的关系也很随和。但我自己比较注意两点：一是当听喝的，不发表意见；二是对文革中的人和事一概不发表评论意见，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表态，这也是“久经”运动之后，学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方法。尽管我自己十分明白，这是一种个人思想上的倒退，是导致失去朝气、毫无主见人云亦云的“臣民”恶习。但在文革那样言路完全闭塞的政治环境下，对于老百姓而言，要想平平安安过日子，这也就是唯一可选的生活之道了。所以，我想只要不让军宣队抓住什么新辫子，你们爱怎么监督就怎么监督吧。当时我个人的情绪已经从对待运动的逍遥，变成了对现行做法的暗中抵制（或准确地说是内心抵制）了。

说实在的，我当时在思想上对国家今后的发展和走向是比较悲观的。记得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周总理在一次全国性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四个有所”的号召，即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是否记得准确，有待查证）。这一号召给予我们这些年轻人以极大的鼓舞，自己也有决心要在专业领域里，努力钻研，做到四个有所的要求。而如今，面对现实，成群的知识分子挤在山沟里接受再教育，难道就能做到四个有所吗？尽管在儿子患病抢救期间，从广播中得知4月25日我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这很令人鼓舞，在那样焦虑的心境下，我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但一枝独秀的技术成就，与四个有所的要求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这一点成绩无论如何也不能遮掩当下科技教育战线上的茫然和无序，长此以往后果必将会显现出来。说心里话，当时我内心觉得，今后即使在干校干一辈子，也没啥了不起。自己绝不担心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且还一定能做到被贫下中农接受和欢迎。因为有“四清”时农村的实践基础，眼下这点艰苦，又何惧之有呢？！

在那段动荡的时间里，我也拷问过自己的灵魂（如果说人真的有灵魂的话），可以说，对当时的一些措施慢慢滋生起来的暗中抵制情绪，是有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过程的。即从开初的不理解和不满意，渐次演变为逍遥。但逍遥是有条件的，即事情还不涉及到自身，

你可以视而不见，或不予理睬，从而允许自己逍遥待之；但当事情已然涉及到自身而且必须表态时，则不可能再逍遥，而只能用口服心不服的方式，行动上从之（所谓保持一致），而内心不满的情绪则日益加重，进而演变成暗中抵制情绪的滋长。而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首先起作用的不是思想想法，更不是什么理论诘问。首先起作用的同样是切身利益受到了冲击，从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自卫”——内心抵制。如一说要去干校，而且地点偏远、时间“无期”，在这种情况下，家中老小怎么办？就如泰山压顶一般，来不得半点含糊。就觉得，解放以来，共产党为教育干部、改造知识分子，就从来没有拖家带口且不给时限这么做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改造问题，哪能株连无辜的家属、亲属和子女们的正常生活呀！这类与切身利益的碰撞的做法尽管有多年来服从组织决定的纪律教育做基础，但在完全无视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个人利益的文革环境中，这些措施必将导致人们内心的日益反感和抵制，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为了获取建房用的石料，我们基本上采用的是松动爆破技术，爆破后，再将炸裂的石头用人力撬落下来后运走。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只开采边坡处的石材，因平房对石材坚固度的要求不是很高；另一方面，这样也可避免爆破时被抛出的碎石过多过远，而造成搬运和安全方面的问题。

在撬动裂开的石块时，我们经常会在石头落下后的裂缝处看到毒蛇（蝮蛇）卷曲着或正在蠕动、爬行。起初大家怕蛇，就哄走了之。尽管人们知道蛇胆是药材，蛇肉可食用，但无人敢于尝试。面对这一“资源”的浪费，我颇觉可惜，总想一试为快。为此，我专门走访了当地老表，问清了剖腹取胆和食肉的方法及要领，并拿了一条已被我们弄死的毒蛇请他示范后才离去。告别前，我将蛇胆和蛇肉都作为“酬劳”送给了他。开始老表不肯接受，我再三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后，他才勉强接受并一再感谢。分手时，他还再三强调道：剁下的蛇头和食用后留下的蛇骨，一定要深埋在地下，因老表大多打赤脚，万一踩到毒蛇的骨头上，扎破脚后也会中毒的。由此可见几千年来流传并保留下来的，为他人安全着想的生活理念和品德，是多么的淳厚。

当我掌握了取胆食肉的方法后，在采石班里我扑捉到好几条蛇，有的我们自己食用了（味道确实很鲜美），有的就送给他人同享。这也算干校生活中的一乐吧！除了食蛇肉外，在采石班我还利用休息时间，去深山里寻找合适的黄檀树，采伐后准备做木工工具（刨床、凿把、锯把等）用，以便今后自己制作家具时有工具可用，也不枉从王师父那学到的点滴木工手艺。别说，在干校期间，我给自己制备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个体木工用的手动木工工具，包括刨、锯、凿、铲、边刨、槽刨、划线器、角度尺、直角尺等。并用这些工具在沙洋干校给自己打了一个纱厨柜（我的第一个作品），用于放置待加工和已加过工的食品（为了防蛀虫）。该橱柜在沙洋的个人制作中还被评为“第一”呢，当然，这只是众多留在沙洋，尚未借由返京的人们的一种自我调侃，并从中取乐而已，不可当真。但那个柜子的木料、样式、质地和漆色等，确实我都是比较满意，只可惜回北京后，因为卫生条件的变化和冰箱的出现而被淘汰了。淘汰，也可以说是社会进步、完善的一种体现吧。

第四节 有了新房

干校的基建（主要是住房）在全力确保下，进展还是可以的。大约到8月中下旬，六排或七排住房已经建起。每排住房有七八间到十三四间房子不等，房子基本按北京的习惯是坐北朝南的，而且南向还有一个前廊，十分实用。但毕竟干校职工人数很多，这近百间房子难于满足要求。所以干校领导决定，每间房子再由中间打一隔段，将其一分为二，变成前后两间，分别分配给双职工和带孩子的双职工居住。尽管这样一来房间的面积较小（我估计每户有近十平方米左右，前间要稍大点），但对一直挤在集体宿舍上下层通铺的双职工而言，特别是那些还要带一个同性别孩子的父母亲而言，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建一个自己的家是何等的奢望和迫切呀！今天看到一排排的住房已经建成，尽管新房既非豪华美观，也非宽敞明亮，但大家看后还是赞叹不已。因为新房的质地远在当地老表住房之上，起码新房墙体不透风，有透光的玻璃窗，室内比较明亮；而老表的住房只有一个小小

的窗洞，白天室内也是漆黑的（当地有一种越黑越富的说法，窗户绝不能开大了），墙壁多数就是竹子编成的竹排，在其两面再抹上粘泥而成。粘泥干后往往会有很多裂缝，故四面透风。两相比较，说有天壤之别也不为过。此外大家满意还在于，一则，这是众多双职工日思夜盼梦寐以求的住所，渴望的家终将落地；二则，这又是大伙儿齐心协力艰苦劳动的结晶，人们在直接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时，欢愉的心情总是十分特殊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大约到9月初，分房方案终于下达了，我们分到一间处于最后一排北向的住房。尽管房间的朝向不好，最后一排房又对着通往坳下村的路边，正处于北风尽吹的风口处，冬天西北风一吹室温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想到的首要问题，因为既然分到了房子，我们就想立即将孩子接来干校，完全由自己照料，以免再发生意外。但孩子终归还太小（一岁半多点），冬天太冷孩子会受不了的。所以在看完新分配的住房后，昭明就向我提出，要抓紧时间来接孩子来干校之前，在房前搭一个小棚子，既可在里面烧水做饭，放一些零碎。更重要的是棚壁可以起到挡风的作用，避免寒风直吹，让室内的温度能少许高些。

对于她的建议，我认为很有必要，而且还觉得完成此事对我毫无难度。只要抽时间上山多砍一些小山竹，外加一些小树干作支柱和棚梁就行了。因为粘土可以就地取材，竹篾就用小山竹破开即可。但我也知道，因采石班的工作还在进行，要求早出晚归，在外的时间延续较长，所以备料只能放在周日休息时进行。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当我突然被军宣队宣布隔离审查后，让我对她和孩子的承诺落空了，导致孩子来到干校时，我搭建的棚子还未上顶、抹泥，给昭明又平添了更多的困难。

大约到9月中旬，我们就搬入了分给我们的新居，尽管房间不大，但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使用的小天地，而且我们也就可以尽快地将孩子从北京接过来，让他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健康成长。从此一块令人永不得安宁的心病，很快就可以彻底放下来了。我们商量好了，昭明准备于9月下旬请假去北京接孩子，而且干校领导也批准了昭明请假的要求。因为要带孩子来，所以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领导批了一个月的假期，对此我们还是很感谢的。

昭明走后，我除了采石外，只要天不黑，我都在山上砍竹子和树枝，准备搭建棚子所需的各种材料。但天快黑时必须抓紧下山，因南方山上的林木较密，黑天后极易迷路，一旦迷路那是很危险的。

开始几天一切都很顺利，采石组收工后，我就带着砍刀、绳子等必备用具上山干私活去了，每天大约都在7点左右收拾下山，当天色开始变暗时，我已走在回家的大路上了。但背着长度两米左右的一捆竹子和木料行走并非轻活，到家时尽管天已全黑了，气温不高，但浑身均已湿透了。即使如此，面对备料的成绩，想想母子二人回来时的情景，内心的喜悦将疲惫的感觉几乎完全驱离了。

当临近十一前夕，收工后我照例上山砍竹子，因穿登山鞋背着一捆竹子走路较累，所以后来我都是穿普通的球鞋上山了。但砍后的竹林地面留下的根节往往较尖，若不慎踩着很容易穿透球鞋的胶底，甚至将脚掌扎伤。所以砍竹子时最好要穿登山鞋，目的就是防止扎伤脚。老表砍竹子穿的都是自己编制的草鞋，而竹尖是扎不透草鞋底，十分安全。那天就是因为穿的球鞋，在砍竹子时脚掌被扎伤，而且还扎得比较重。因随身没有救急包一类的急救用品，我简单处理了一下，拿了砍刀和绳子就赶快下山了。

回到干校后，自己先清洗了一下，就赶紧去校医室检查处理。护士给做了消毒清洗，并涂了消炎药膏，进行了包扎。大夫还想给我一点口服消炎药，但我告知大夫磺胺过敏后，大夫说没有其他不含磺胺的口服消炎药，那就算了。并说估计问题不大，若伤口真的感染，那时只好再打青霉素了。但此前因我已写信告诉我生父的老友，准备十一假期去抚州看望他老人家，故我担心届时万一伤口出问题去不成，会让老人心里不悦的。所以，我还是请大夫给我几片含磺胺成分的消炎药，想作为备用，服量少点帮助控制，觉得不至于出什么问题。大夫没有拒绝我的请求，给了我一些药，但嘱咐我用药一定要谨慎，过敏是很危险的。

回到住处后，因心里总想着吃不吃消炎药的事，我只简单地吃了点东西。最终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决定作为预防感染发炎的措施，我服了1/3片药，而且睡前还喝大量的

水，幻想不至于发生过敏反应。但事实是残酷的，到次日午夜3时左右，口腔和下身粘膜就开始出现红斑，进而演变成溃烂，发展速度很快，令人十分难受。但因时间尚早，去校医室会惊动他人，影响别人休息。故我直到凌晨5时半后才去到校医室，说明了服用含磺胺消炎药后过敏之事。大夫查看了相关部位的溃烂情况，当即让我服了强的松类抗过敏药，指出我既知自己磺胺过敏，还如此蛮干太危险了。并告诉我，因我的服用量很少，估计过敏情况会很快得到控制，但溃烂处只能慢慢地痊愈。当红斑不再继续出现时，抗过敏药需逐渐减量服用，不能立即停止。这次因心存侥幸而导致的服药过敏一事，不仅大大影响了搭建棚子的进度，而且身体的不适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它也给予我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即面对科学上已有定论的事情，来不得任何违规，不允许有任何侥幸的想法和做法，否则定将受到严惩。尽管过敏情况迅速得到控制，但因身子下部的溃烂并未痊愈，故行走有些困难。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十一假期时，乘车去抚州看望了老人。他是按林彪的一号命令，由中组部安排于70年7月底疏散到江西抚州的。听老人讲，他们这批将近有十名老干部，都住在地委招待所的大院里，在那的两天里，我在院子里还见到了王震和袁老（名字记不得了），其他几位过去未曾见过，也不很了解。在生活安排上老人的一切都较好地得到了保证，只是身边没有自己的亲人，和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感到相当孤独。

他跟我讲了，他已向中组部打过招呼，要求调我姐姐过来，而且组织上已经同意，准备调往抚州市中学任教，届时能帮助、指导服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实际上，从他的讲话中，我理解他主要是想通过我姐姐可以更多地知道一些社会上的鲜活的情况。因为我是一个白丁，很多事他不会和我讲，但看得出他内心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忧虑，所以他也问了我很多干校的情况，而且还特别嘱咐我在言谈和行事上，要多思，要谨慎。这类嘱咐，以前他是很少向我提及的。

我聆听着老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也有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谨言慎行的思想准备。但天算不如人算，在地院，一场更大的整人风暴已经悄然地酝酿了多时，并已将自己笼罩

于其中，只不过还暂时没有收网而已。确实，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是自己所能完全掌控的。中共从建党以来，打着革命旗号整人的事例屡见不鲜，要不何部长为何在水边干校会对我说：革命嘛，难免不挨整呀。这也是他自身经历的很好总结。但说句老实话，当时的我，心底里已经没有了文革初期的革命激情了。成了家而且有了孩子，还有需要自己照顾的老人，我只想过一个凡人的安定生活。如有可能，尽量能学有所用，在专业上能发挥自己的所长。否则，即使在干校，能做些实事也就足矣。文革的实践到当时，已经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即搞政治的人，一方面需要有大智慧；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品行，而非常人所推崇的善良人性。对共产党而言就是阶级性，并常冠以“党性”的美名。没有这两点是不能去从政的！而我自己恰恰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故还是老老实实地顾家为好！但后来的实践又让我明白一点：你个人不想搞政治是一回事，但若因政治需要而整你，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整你没商量！

在抚州我陪老人呆了两天两夜，临行前，他还让我告诉昭明，希望她带孩子回干校时，能绕道来抚州看看他。面对老人的孤独感，我不能拒绝，答应一定写信告诉昭明。

我按时于3号晚回到干校。过敏的症状已得到控制，正在逐渐恢复中。假期结束后，生活似乎又回归正常，但“抓五一六”的风声却越吹越紧，一场新的政治迫害悄然到来，我个人的干校生活，即将掀开更加痛苦的一页。■

【文摘】

良知漫漶的岁月

屈长江

对于野菊而言
 花开花落
 都是自己的事
与他人的赞赏和叹息无关
 对于灵魂而言
 堕落赎罪升华
 都是自己的事
与他人的同情、宽恕和企羡无关
 不求有圆满的结局
 只求有自觉的过程
 个人如此
 民族也应如此
——作者题记

缘起

1967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的群众组织《红旗飘》被江青点名。江青不仅在召集北京各大学群众组织的头头的大会上诱过于人，而且诬陷说《红旗飘》中有坏人，我们当时真的被弄晕了，把《红旗飘》全部成员及其家庭成分的名单托人递给中央文革，让他们指出坏人是谁。记得是王忠林提出让我们理智地冷静下来，好好地学习有关文件资料，回顾

和反思一下文革的全程，以确定自己的认识角度和立场，对当前形势有一个清醒的看法。

于是原《红旗飘》的几个成员带着怨气开始了学习。从文革初起，回顾到毛主席提出“解放军不听我的，我就上井冈山打游击”；回顾到七千人大会；回顾到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回顾到五七年整风反右；回顾到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捋出的一条党内重大政治斗争的历史线索，似乎印证了传说是康生说的那句话：“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这对我们这批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的政治忠诚和良心无疑是一瓢兜头的凉水。自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对毛泽东及其后期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陆陆续续地说出了一些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议论和怨言。贾平凹说，话有三说。我们选择的基本是第三种。比如，说毛主席搞的是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一言堂啦；林彪的“四个第一”、“一句顶一万句”和“顶峰论”是唯心主义，像个赫鲁晓夫啦；有一种文革理论叫“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啦；中央文革出尔反尔搞两面手法推罪给群众组织头头啦；说刘少奇是叛徒是天大的笑话啦；彭德怀反党集团是冤案啦；等等。这些话放在十年以后，人人都会说自己也是这么想过，这么说过的，可在当时确实是十恶不赦的反动言论。

终于有一天，我们暴露了。校文革的头头聂元梓把我们定为“牛辉林现行反革命小集团”，把材料报到了中央。虽然毛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不要杀牛宰猴”，“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攻击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引自《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但下面的人可不作此想。于是，我们这几个人就被对方的群众组织、工宣队、军宣队和后来的8341部队先后隔离审查了若干次，若干年月。先是被军宣队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交给群众专政监督改造。后被8341部队定为“五一六”分子，不了了之。

事情不难说清，难以说清的是灵魂的耻辱和良知的崩毁。下文谈到的诸事，均从这样一个当时的角度、身份和心态入手。

圣言与私语

记得刚上北大时，二年级的张荣德师兄曾经开玩笑式地告诉我，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论文的写法是，“首先，‘马克思说……’，其次，‘恩格斯说……’，‘列宁说……’，‘斯大林说……’，‘毛泽东说……’，最后，才是‘我说’！”当时一笑，没往心里去。几十年后，我才咂摸过味儿来。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铁律，是圣言的逻辑。

说说我被审查时最怕听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也不是记不清出处的“对于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罪犯，我们应予严惩，不能手软”，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你想象一下，一个犯了政治立场错误的年轻学生，在接受群众批判时，面对一个班，一个系，甚至全校上万的师生，大家一起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第若干页，大声向你念或唱这段话的情景。简直象张艺谋的大片《英雄》里攻城一方万箭齐发的阵势，心里完全毛了，恨不得自己缩小身形，躲到老鼠洞里。

为什么是这么个心理状态？事后我才明白过来，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你应当相信别人，你应当相信党组织，而不应当相信自己。放弃你的思维，放弃你的想法，放弃你个人主义的立场。在我们面前，你永远是对的的一方！”前面的缘起中说过，我曾经站在个人良知和事实经验的立场上反思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领导层的言论和行为，我曾真实地感受过这种政治风暴中发动方的专断和跋扈，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言堂的逻辑。但它是通过什么实现这一点，降服人心的呢？就是用这段话。它是毛主席说的。它是最高指示。它是圣言。从表面上看，它是完全正确的。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当这种圣言与我们个人的私语发生冲突时，它的“神圣性、权威性”就成了强权的话语。何况是那样一种“千夫指，万众怒”的场面。这种人民战争的场面，没有鲁迅那般的硬骨，是谁也顶不住的。它让你放弃个人思考，不管你的想法是否正确。你应该放下武器，无条件地投降。难道你不想成为革命群众中的一员吗？！难道你能说你比党组织更英明伟大吗？！

这是一个不易察觉的却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它不仅可能解除一个青年学生的思想武

装，而且可能摧毁他的个人意志和道德良知，背叛自己，自己把自己绑在道德良知的耻辱柱上。是啊，马克思说，恩格斯说，列宁说，斯大林说，毛泽东说……，那么，我个人还有什么可以言说的自由空间吗？何况他们说的，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就被带到沟里去了。历史的阴沟、政治的阴沟、良知的阴沟。

当一个人在强权的话语而不是真理的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良知时，是什么样的可耻的事都可能做出来的。这道理，对小人物和大人物都是一样的。

语录与阐释

编纂《毛主席语录》绝对是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大贡献。文革中语录的发行量绝对比《毛选》的发行量大，说全国人民人手一册都嫌少了。试想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宏大场面：有什么能比它更快速有效地控制好广场政治的走向，统一人们的步伐？《语录》在汉语语境中是个有宗教色彩和神圣性的词汇。知道佛教禅宗的《古尊宿语录》么？它把博大精深的宗教道理用只言片语表达出来，悟不悟得透，那就是参禅者的事。

说实话，在文革中，我虽然也通读过《毛选》四卷，甚至通读过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文集》八卷。但在具体行动中，运用得最多和最顺手的还是那本小红旗。鲁迅先生说“无聊才读书”。（《鲁迅全集·集外集·赠邬其山》）我的体会是，入狱才读书。听说彭真就是在入秦城监狱那些年才通读了《马恩全集》的。我被群众组织隔离审查时，通读的是《毛泽东文集》八卷。被系工宣队隔离审查时，同室的三年级的刘和生同学通读的是《列宁选集》四卷。被校工宣队隔离审查时，就只准读《毛选》四卷了。1971年，再被8341部队揪回北大时，因为事出仓促，基本上就没得书读了。幸好拾得了看守人员抄录的十几张词谱卡片，如获至宝，玩味吟咏了好几个月。所以，监狱才是真正的《我的大学》。我们班的几个同学，被排斥在新北大公社这个群众组织之外，于是自成一体，取了个名字，叫“犹可训”。是“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两句毛主席诗词里的一词。什么意思

呢？是自嘲也是自我保护。我们是愚氓，但不是妖——因为我们的成员中有几个曾被视为“反动学生”。我们本能地用圣言来保护自己。

在我被隔离审查的初期，组织上要我交代“反动言论”。我往往在抬起头先写一段毛主席语录。一是表明自己的心迹和立场，以示政治上的忠诚。二是所选的语录总被我用来为自己的言行辩护。后来到校工宣队审查时，就不让我那样写交代材料了。到再后来交给群众专政监督改造时，同宿舍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一起“早请示”了。说我应该“早请罪”。我被剥夺了对毛主席语录的引用权和阐释权。所以，我对当时人们写信或说话之前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心态，特别能理解。

其实，我当时最想引用而又不敢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1968年7月28日讲话中关于对我们应如何处理的语录：“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同上）等等。就当时的情形，我敢吗？！即使我敢，有用吗？！

所以说，圣言虽然是圣言，有神圣性，有权威性，但一旦编成语录，传播海内，人手一册，就像西方人忽然后人手一册《圣经》一样，每个人都有了引用权和阐释权，可以有自己的“有限度的”理解和“有限度的”利用。用得好的，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可以贩些私货。这就是文革中每次发布最新最高指示都会引起两派斗争加剧的主要原因：同样的一句圣言，不同立场的阐释者都可以用来贩卖自己的私货，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正确性、真理性。真理只有一个，阐释却有二种，那还不得打起来？西方的新教为此就被对方杀死不少人。何况，任何话语都不能脱离它的语境，脱离它的上下文。一旦脱离开来，变成语录，其意义的含混和游动，就可能成为双刃剑，其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这种文革现象，叫做“打语录仗”。你看华国锋打倒“四人帮”时，就用了毛主席的语录：“你办事，我放心”，证明了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正统性和真理性。邓小平放倒华国锋时用的好像是：“邓小平政治强，人才难得”。这叫做“完整地、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意思是：你引用阐释得不对，我才是真正完整地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自从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打

语录仗的现象就彻底消失了。因为他的阐释已经转化为新的圣言，人们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引用毛主席语录了，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当然，必须引用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语录，比如他的“猫论”和“摸石头论”。

忠诚与背叛

政治忠诚对于我们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而言，不是基本功、必修课，而是娘胎里带来的本色。所有同学的出身，不是工农就是高干子弟（如果12级以上就算高干的话。）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一回事。“三忠于，四无限”嘛！

忠诚不只是一种理性或非理性的信仰，它更是一种血脉相通的感情。但是，忠诚也是有两面性的。在文革中，尤其是对于在文革中那样处境中的我而言，对一方的忠诚，就是对另一方的背叛，更是对自己的背叛，对良知的背叛。读过雨果的《九三年》么？

我们被隔离审查时，并不太怕打和骂，也不太怕威逼和诱供。最扛不住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跟我们大讲阶级感情，讲出身，忆苦思甜。前面在缘起中说过，我们几个人不论是法律系还是政治系的，出身都是“红五类”。所以人家一讲到出身，一讲到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我们一个个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精神上就扛不住了。有一种要把一切都实实在在地交代出来的冲动和愧疚感。谁说中国只有乐感文化没有罪感文化？每当这个时刻，我们就像跪倒在上帝的面前，罪感深重，抬不起头来。

我大概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曾不止一次被这种忠诚和罪感压倒，背叛我们的“攻守同盟”，坦白出我们的“反动言行”。

记得1971年初春，已经毕业的我又被揪回北大，这一回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当时对系里8341部队的领导人说：“我们的事不是已经平反了吗？我和王忠林还找过迟群，问以后再搞运动整我们怎么办？迟群拍着胸脯承诺：十年之内，有人整你们，让他来找我！”

领导说：“那次是那次的政策，这次是这次的政策。”弄得我莫名其妙，哑口无言。

大约一两个月以后，我被叫到校 8341 部队某个办公室里去训话。训话者是位女同志，三十来岁，军装，短发，训话的神态，口气，总让我想到传说中的谢静宜。训话的情形大致如下：

首先，她问我交代得怎么样了。我说，过去交代过的，又交代了一遍。她听了后怒斥道，这次要交代新问题，就是参加“五一六”的问题。我说，我不记得有此事。她说，我们是 8341，你应该了解的。你不是“五一六”，我们会把你大老远的弄来吗？！我们有实打实的把握和证据。我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你要准备一份坦白交代大会上的发言。记不记得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回忆交代。先坦白交代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事。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我能怀疑曾经为自己平过反的 8341 中央警卫团吗？我能怀疑这位可能是谢静宜的女领导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吗？我只能怀疑我自己早已被几次隔离审查弄坏了的记忆力和脑袋了。

于是，开大会那天，牛辉林上台坦白交代完以后，我就走向了会场的讲台。半路上转头一看，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的“同伙”纷纷起立要求坦白交代。怎么又是我！第一个把自己绑在背叛良知和道德的耻辱柱上，让我悔恨一辈子！

我中了“忠诚”和“信任”的圈套！

大约七八个月后，8341 部队的王连龙政委笑嘻嘻地来到我的隔离室，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8341 也搞逼供信！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我记起来了，我参加的是《红旗飘》的红卫兵。”王政委嘿然不悦，脸拉得长长的，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出事了。与三叉戟同时坠地的，是我的政治忠诚。

从此，我也就没有了背叛。

但，真的是没有忠诚就没有背叛了吗？我想，这只是对我这样的小人物而言。对于那些大人物，则未必，说表忠心就表忠心，说认错就认错，说揭发就揭发，说翻案就翻案。

而且是只准他翻别人给他定的案，不准别人翻他给别人定的案。也许对他们而言，根本就无所谓忠诚和背叛。那些大人物后来做的事教我明白了这一点。

孟夫子不是说过吗：“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这才是真正的圣言呐！

政治罪感与伦理罪感

回过头来再说说“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话题。学术上的事自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是想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感心理做一个回顾。为了描述的方便，我生造了政治罪感和伦理罪感这样两个词。

还是从具体事情说起。我们几个人虽然在私下议论中央文革时知道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牛辉林也曾一再警告我们中的人“不要乱说”，但我们在议论的当下并没有恐惧和罪感。政治恐惧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有的。因为不知道对方掌握了多少真实的证据，就产生了一种对政治惩处的想象性的恐惧。政治罪感则发生得更迟，是审查方把一切证据落在实处并告知我们时才产生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定罪之后服了罪才产生罪感。不定罪，或不服罪，是不会有悔愧内疚的罪感的。所以各种组织开始审查我时，我的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没有明显的政治愧疚感，总能找到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顶不住这种恐惧时，我也曾想到过自杀，那种心理的崩溃，是一种对未来的未知而造成的。几次审查前前后后有六个月，这种政治恐惧感也就积累了漫长的半年，好几次产生逃跑和自杀的冲动。

然而真的宣判了自己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和罪行时，恐惧感反而瞬间消失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一个新的心理阶段开始了。罪名落实了，我也认罪了，用当时审查方的话说我要“重新做人”了。没有罪感是谈不上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越想重新做人，越是罪感深重。我不再想着逃跑或自杀了，想的是：“爬也要朝着革命的方向爬，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爬。”前文不是说过，同宿舍的同学不愿意与我一起“早请示”吗？那么我就

一个人“早请罪”，争取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当然，这种服罪心理也不是死心踏地的，中间有过几次反复呢，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但奇怪的是，到了半年以后，北大的8341部队给我们平了反，说是63军和工宣队搞了逼供信，我们只是“小将犯错误”不是“现行反革命”之后，我的罪感心理马上消失了。事，还是那些事，话也还是那些话，材料虽然用一根火柴烧光了，那些事和那些话还在那里，我却不再有罪感和愧疚，不再想什么脱胎换骨的事了。从此走路抬头挺胸，理直气壮的人，真是一种奇怪的政治动物。

可见，政治罪感是两造的事，一造不定罪或一造不认罪，政治罪感就不会产生。所以，喜欢搞政治翻案的人，是永远没有政治罪感，没有愧疚心的。而且我发现，政治罪感与时间成反比，时间越久，罪感就越轻越淡。到1971年8341再把我当“五一六”分子揪回北大时，我已经有点像个政治犯中的老油条，几乎没有一点罪感了。所以我想象，政治罪犯得越多越大越久的人，很可能越没有罪感。政治罪感，应该只属于我们这些小小的，小小的平头百姓。

然而，伦理罪感却不是这样。如果说，政治罪感对应的是君臣之义，伦理罪感对应的就是父子之义、夫妻之义、兄弟之义和朋友之义。两者之间，有个公域与私域的区别。在平和安定的年代，政治和伦理可能相安无事。公私分明即可，不必“大公无私”。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的政治风暴中，政治之义和伦理之义却非常可能发生剧烈的冲突。不是简单的“忠孝不能两全”而是水火不能相容，两种罪感轮番折磨，无论怎样心理上都是痛苦的。这里对父子、夫妻、兄弟之义就略去不谈，主要说说朋友之义。

文革中的同一派人叫做“革命战友”如果更加亲密和信任，就是江湖义气中的同志加兄弟般的朋友了。对朋友的背叛而产生的良心上的愧疚痛苦，我称之为伦理罪感。

长话短说，我们几个革命战友的“反动言行”露了，政治上认了罪，就得彻底交代。因为事不是一个人做的，话不是一个人说的，一彻底，就要供出同学、战友、朋友。当然，死不认账最好。既无政治罪感的折磨，也没有背叛同伙，没有伦理罪感的愧疚。一些久经

考验的老革命就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聂元梓就说过：“一口咬定，死不认账。”但如果涉人较多，团体较大，就会出现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几乎没有一个能死扛到底的。对于我们这些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年轻学生来说，结局几乎是一定的：陆陆续续地，几乎是各人都一步步地挤牙膏似的退却，直到供出了别的人，供出了最要命的反动言论。于是朋友之义，用工宣队的话说，“江湖义气是靠不住的”，终于坍塌了。政治罪感越强烈的，对朋友的背叛就越彻底。我就属于这一类人。虽然我很羞于直面这一点，但良心不容我不实说。

若干个月后，我们被平反了。前文说过，从那一刻起，我的政治罪感瞬间消失了。可是，我几乎不敢面对此案涉及的其他人——这是一种良心上的愧疚和痛苦。它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它是拿不出来，不能辩白的，更是翻不了案的。不管朋友是否原谅了你，这东西如胸中垒块，长在肉里，永远也去不掉。无私，真的就无畏么？有的时候，它是无耻。

因为，它是伦理的罪感，它不需要另一造的证据和定罪。它就在你心里，只要你有良知，有伦理道德上的自觉，它就牢牢地坐实在你心中，黥在你的脸上，不仅不会淡忘、消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让你——我指的是我自己，悔恨非常。它是我灵魂中的丑恶，人性中的黑暗……

因此，后来我常常想，对于文化大革命，如果它的参加者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感和良知的悔愧，没有一点儿反思和警惕，这场文革恐怕永远不会终结。不知什么时候，它又会找上门来。因为，在我看来，它绝不仅仅是一时的错误，也不仅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而是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必然的表达的一种。读过奥威尔的《1984》么？是的。

噩梦是怎样炼成的

自从1971年，我又一次被8341揪回北大隔离审查八个月，然后又不了了之地放回乡下后，我就开始重复性的做一个噩梦：我又被抓回北京大学了，我们又被定什么罪名了，这个噩梦从我二十多岁一直做到五六十岁。最初，梦境清晰而紧张，几乎每月一次。随着

岁月的推移，渐渐地，噩梦的紧张度弱化了，间隔的时间长了，但依然辨得出它的基本特征：在北京，在北大校园，在被囚禁的 28 楼。还是那几个人。它几乎伴随了我一辈子！

它是由什么炼成的呢？是政治罪感吗？不是。早在 1980 年北京卫戍区来函告知我在文革中的材料已全部销毁，政治上彻底平反之前，我的政治罪感早就消失了。是伦理罪感吗？也不是。伦理罪感是一种清醒而有彻骨之痛的自觉的理性意识，不是梦的构成原因和材料。多少年之后，大约是中国再次出现政治风暴的时候，相似的政治环境使我突然明白了：是对政治惩处的恐惧感造成了潜意识中的伤痕。这种政治恐惧的伤痕，不是在第一次的政治惩处之后出现的，而是在再次的政治迫害（因为我根本不是五一六分子）之后出现的。如果它是一次性的，是有真凭实据的，也许我不会那么的恐惧。但当它反复出现时，当它是凭空捏造的时，巨大的政治恐惧感就会在我精神的最深处留下一道久久抹不去的伤痕，它会在潜意识中扎下根来，月月年年，开出噩梦之花。（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曹雪芹为什么会写出一部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小说——《红楼梦》了。——他被圣上抄过两次家哪！）

由此，你可以想见我这半个世纪的性格和命运。（当然，我不是贾宝玉，没有遁入空门。）

在当代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噩梦，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做这样的噩梦，更不知道这样的噩梦还会再做多久。这也算是中国梦的一种罢。

从圣言到私语，从语录到阐释，从忠诚到背叛，从政治罪感到伦理罪感，再从罪感和恐惧到噩梦和潜意识。我已经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精神之域从表层剖割抉剔到了最深层。

我已经说了。

我是否能够赎回自己的灵魂？ ■

此文原载《燕园风云录》（四）（自印书）胡宗式推荐

【读者来信】

1. 北京大学谢定国（扬子浪）先生来函

尊敬的《记忆》编辑部同仁们：您们好！

首先感谢《记忆》在近两年前，打破一般不转载文章的惯例，在132期转载了我已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上发表的《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扬子浪》，使国内的文革研究者和读者也能容易地看到这份文革资料。在中国当局长期不公开文革档案的情况下，这本日记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些虽然局部但实时实地记录下来的文革信息和情感充沛的个人感受。我欣慰地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文革研究者在他们的论文和著述中引用了这本日记中的一些相关记载。

今年年初，我决定把这本日记的原件和其他一些文件捐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1月6日，我在胡佛研究所向胡佛档案馆东亚部主任林孝庭先生面交了我捐赠的文件。1月20日我收到了由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馆长Eric Wakin 签署的英文捐赠协议，东亚部主任林孝庭先生的中英双语的证明和感谢函。林先生的信函较短，全文照录如下：

（英文部分略）

兹证明谢定国先生将其私人文件捐赠胡佛档案馆，成立《谢定国专档》，内容包括谢先生私人日记（1965、1966、1967年）、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在1968年颁发的北大毕业证书、北京大学在1980年重新颁发的学历证明、父亲谢达三自传、妻子钱珠丽女士家谱、家族照片等。胡佛档案馆相信这些文件，将为来自全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提供珍贵材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谨以此信函，向谢定国先生表达由衷感谢与敬佩之意。

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主任 林孝庭（签字）敬上

林先生信函中提到的私人日记，共两本。一本起自1965年1月14日至1965年11月22日，另一本起自1966年8月5日至1968年2月2日。后者即是贵期刊132刊发的《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扬子浪》的原件。

正如我在致贵刊的信中（《记忆》133期）说的“我那本日记，如果还算青铜器的话，还在，没有去锈翻新的清理。在华夏文摘上的发表稿，也就好比一张旧物的数码相片吧。考虑到最广大的读者，不是历史学者，作了些技术处理。例如：更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增补修改了些标点，修订了一次重复月份的错误。还删节了估计有几千字吧，主要是在桂林的芦笛岩游记，和抄的一些大字报，如毛主席和王海容的谈话等。另外因为隐私的原因，用了一些化名和代词，如‘某些人’等，有时甚至删掉了主词。”在若干年后，如真有文革研究者，对《日记》一字不差的原件有兴趣，他可在胡佛档案馆查阅到这一原件。

随着我们这代文革人的老去，关心文革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文革这个话题肯定不会在历史的天幕上消失。后来的历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一定会为了人类的福祉绵延不绝地继续研究这个让天地翻覆又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

祝编安

谢定国敬上

2017年2月12日 ■

2. 北京四中老高三任富田谈王复兴文

我是北京四中1966届高三二班学生，读了发表的王复兴的《北京四中的学潮和社教》（《记忆》第169期）一文，很有感慨。四中的学潮发生于1964年深秋，我正上高二。我班在团支部的组织下，对同学王XX展开批判，利用教室后墙贴出小字报，标题好像是“……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已经记不起来该同学主要的“言论”或“罪行”是什么，好像是“资

产阶级情调和作风”的问题。我的印象中，高二年级6个班，除高二6班外，每班都有一名同学成为批判对象：陈XX，王XX，徐XX，韩XX，周XX。

王复兴所在的高三年级是重点，我们也听说有一个“出身富农”，要“进中南海杀毛主席”的反动学生毕向明。当年我不了解更多的整学生的情节，也不方便（不敢）到处打听，因为不是红五类出身，不能“扎根串连”。文革中看到批判北京市委和万里的大字报，又见到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上暴打张文松，并质问张文松“谁是小王八蛋？”猜想万里、张文松当年批评过闹学潮的干部子弟，文革中，红卫兵要报仇雪恨了！

多年来一直希望对四中的学潮和“四清”有一个较清晰、较全面的了解，读了王复兴的文章，如愿以偿，甚感欣慰。

对于文中的失误和遗漏也想在此指出。

1. 张文松是市委文教部部长，不是文教书记。邓拓是市委文教书记。
2. 《舞台姐妹》是1965年放映的，不会在1964年被批判。
3. 做为学潮的背景，是否应该增加“接班人意识”一条？《青年一代》中的肖继业形象，宋心鲁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等一系列的教育，使干部子弟的“天然接班人”，“当然接班人”意识强烈，背后的“打天下坐天下”“红色江山传万代”的观念涌动。
4. 在“四清”工作队进入四中以前，高三四班应该也整了毕向明？那时班里的学潮积极分子根据什么东西整的毕向明？仅仅因为他爷爷被划为富农？他有什么反动言论或行动？
5. 关于八中的学潮，希望八中的知情人予以回忆、披露。王复兴文章只说了“市教委说服了陈晓鲁等高干子弟，结束了学潮。”我曾看到文章说这次四六八学潮，四六八各校均打了一个反动学生。八中的叫查建中，幸运的是查建中又被当做可以改造的典型，执行阶级路线宽大的典型，被清华机械制造专业录取。六中被定为反动学生的不知是谁。

《记忆》171期刊发的钱理群的文章《关于文革的反思与反省——教育体制人性国民性》有深刻、全面的阐述。

当年的当事人都已七十出头，为了历史惨剧不再重现，抓紧时间吧。■

3.宋翔雁谈地方文革史的编写

181期我大致浏览了一下，谈一点意见，供参考。

1. 对编者的话理所谈到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把地方文革史的编写突出起来的因由分析非常实际，因亲历者的年龄已不容再有拖延。必须抓紧实施；

2. 要开展地方文革史的编撰，我觉得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班子，做一些初期而又必要的组织工作和人员分工。只有这样，才能开始搞一点顶层设计（诸如大事记等），逐渐展开相应的工作（含发动和组织参与者）。但编者的话中对此却毫无谈及，也没有谈到目前各省市有无相应的牵头人员和班子，或刊物已有了相关的联系人和对象。我觉得对班子组建应当有所考虑。

3. 关于以大事记作为切入点的想法，我基本同意，但还想做一点补充。即应将该地区的大事件作为切入的突破口，如广西的文革史就选择了“7.25”中央接见两派的讲话这一重大事件作为突破口。从此向前和向后一步步就能将当地的文革历史逐步转开了。■

4.杨隽谈地方文革史写作和美国国会档案

收悉贵刊第181期，有两个地方有话要说，也算是完成会员的一点任务吧。

1. 贵刊开头编者的话我深表同意，地方文革史的确是一个可以突破的方向，且不要说各个地方，就算是被认为是“中心”的北京，除去城区一些较为重大的事件有所研究，郊区县又有多少研究呢？比如说房山、通县，研究都很少，若是能把这些地方研究透了，那也是对“中心”地区的文革史的贡献。

不过，在研究地方文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细节局部的叠加不等于整体，地方上的文革跟最高层的文革息息相关，虽然目前宏观上研究推进愈发困难，但困难并不等于我们没法去做，还是要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在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因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提高不在于面而在于质。

2. 关于眉间尺谈到美国总统图书馆文革资料。其实，文革初期的时候，美国的 CIA/FBI 曾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做过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专题的研究后来做成了一个叫 POLO 文件的档案，这个档案对美国的外交决策即跟中国建交有较大的影响，这点在前美国驻华大使 FBI 香港情报站站长李洁明的回忆录中有体现，这份文件早就已经解密，可以在 CIA 的网站下载。沈志华等所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并没有把这个编进去。不过，我个人认为，美国这些档案的参考价值远不如沈志华的苏联档案，原因很简单，铁幕隔离，双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即使在中美接近之后，情况还是这样，美国从中国获得信息的渠道很有限，非常有价值的核心信息美国是没法获得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工作最好由西方国家的图书馆馆员来做，比如宋永毅、周原等诸位先生，他们做这个比国内的学者要方便得多，也在行得多，国内学者的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本土资料的整理和搜集上。

另外，说到美国图书馆所藏的文革资料，我记得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馆长吴文津先生在上个世纪 7、80 年代的时候做过专门的调查，这些情况都收集在了他的《书林揽胜-台湾与美国存藏中国典籍文献概况》和《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中，说得非常清楚，我个人很推荐，感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一看，只是现在离吴先生做调查的时候又过了好多年，不知道现在美国图书馆里所馆藏的文革资料情况如何？我想这些应该是让宋永毅、周原等诸位先生调查了解为最好。■

5. 郭予庆谈校对及萧宏文章

发来的 181 期《记忆》收阅，甚谢！在阅读文本时，顺便对照了一下校对手记，看到我校对时提出的文字问题都得以妥当技术处理。感到《记忆》现在这种多人轮换阅看、校订的校对方法，既可避免阅读疲劳，又可分担校对工作量，可以说是适宜的。

本期刊登的萧宏《广西文革解码》，资料发掘深入，文献引述丰富，史实脉络梳理清楚，对于 60 后的萧宏，殊为不易，为各区域文革脉络的梳理、发掘提供了借鉴。期待着他的后续研究。但是，细读萧文感到还是有一些内容上和文字上可以商榷的地方，待阅读完萧

文后续部分后将一并去函写出。■

6. 俞小平谈北大文革

对于北大文革的回忆录和争论，虽然两派有人对贵刊所载文章有所不满，我的主张是对两派文章来文照登。为了未来的文革研究者，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资料。■

7. 碧琼子谈广西文革和萧宏文章

读 181 期萧宏先生所写文章，我对其中两个观点有不同看法，不揣冒昧，说明如下：

1. 萧文认为，广西的造反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从我对广西造反派的了解看，难以得出这一结论。对造反派的研究和定位，是文革研究当然也是广西文革研究的重要课题，简单地否定和过分拔高都是不足取的。事实呈现出的造反派状况纷繁复杂。‘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一界定不能概括实际情况，失之简单和主观。

2. 萧文认为，”七三 布告为韦国清提供了镇压机会‘。我所了解的情况，许多迹象表明，七三布告是因韦国清等人的精心构陷而产生，其后再其被利用。

还有几处细节和文字处理上，小有瑕疵：

1. 第 26 页，“实为联指炮火所击”，位置不对。

2. 第 40 页“张英”“应系”章英“所误。

3. 第 40 页，关于”无名大水“前后三处提及，互有重复，且前后略有不一致。例如第一次出现，成为“无名大水”，这个说法是不妥的，因为无名实为有名，是联指在韦国清的默许下炸开水库所引来的大水。后面又说明了，所以前后矛盾。■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杨新敏 丛立新 潘去病

本期版式：启之